

#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06年

**陕甘宁边区 —— 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李昌：我与耀邦共事**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医多不治帝王病**



## 目 录

### 新年寄语

- 1 我们和历史一起进步……………本刊编辑部

### 春秋笔

- 2 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陕甘宁边区十年变革记略……………笑 蜀

### 怀人篇

- 10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  
——杜导正同志访谈录……………徐庆全
- 18 我与耀邦共事……………李 昌
- 23 共青城的思念……………万绍芬

### 求实篇

- 24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王 泓
- 32 中外人工合成胰岛素比较……………熊卫民
- 36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余广人

### 人物志

- 42 费孝通在五七干校……………刘 晓
- 48 熊希龄退出官场之后……………龙儒文
- 53 上海交大首任校长唐文治……………周金品

### 往事录

- 56 三十年前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王忠人
- 62 难忘的一月八日……………董克发
- 63 在日寇大屠杀中幸存的婴儿 ……王纯口述 邹贻整理
- 64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陆 德

### 一家言

- 66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冯东书
- 68 “实事求是”考源……………甘惜分

### 古今谈

- 69 医多不治帝王病  
——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章立凡
- 73 告别科举的曲折……………王 毅
- 77 润笔今昔……………韩士奇

### 编读窗

- 78 《炎黄春秋》读后感……………徐亚峰
- 79 毛泽东约见塞克的史实……………高 沂
- 80 关于《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的几处小失误  
……………钟兆云
- 80 《炎黄春秋》感人至深……………张 耐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李耀文

###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 我们和历史一起进步

● 本刊编辑部

退回四十年，文革开始。退回三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们参与了前贤没有经历过的社会实践，见证了新的历史进程。

对比跨越两代人的历史实践，我们有一个感悟：论走路，一条腿不如两条腿，两条腿不如四条腿。同样，思考问题，一个脑袋不如两个脑袋，两个脑袋不如四个脑袋。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依赖单人或单个社会集团积极性的办法更高明，也更稳妥。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这种感悟或许可以提升为“科学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来自历史实践。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观也随之前进。历史实践已经证实：大包干比人民公社高明；改革开放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高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高明；集体领导比个人崇拜高明。国内国外、城市乡村、集体个人，各种社会力量都得到尊重，权利得到保护，因而发动起来，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加快了。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各个社会集团一起行动起来，一起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如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如何争取双赢局面，如何在和谐中开拓前进，就成为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让人们讲话，让各种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争论，交流，妥协，合作，达成共识，建立众人认可的规则，然后彼此监

督、贯彻实施。这些经验，汇总起来，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努力追求、文革后汲取教训反复重申、中共十六届各次全会一再呼唤的民主制度。孙中山总结世界和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历史潮流，凭借民主制度谋求社会和谐发展，体现了以中外历史经验为依托的科学发展观。以这种制度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便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热切而乐观地盼望和谐社会的圆满到来。

《炎黄春秋》已经办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们遇到过无数困惑，常常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唯一坚定不移的宗旨就是实事求是。十五年的实践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宗旨也是一大批作者和读者共同坚守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上，不同的意见可以统一，不同的主张可以调和。而且，这项宗旨也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入世界历史潮流，使我们的观念随着历史实践，跳出了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从不高明到比较高明，最后得出了与科学发展观一致的结论。这大概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吧。

我们随着历史进步了，我们的杂志也随着历史进步了。我们希望在新的的一年里，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继续进步，并和作者、读者一道推进社会进步。在科学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看来，人民群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 ——陕甘宁边区十年变革记略

● 笑 蜀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注意到了这个动向，在《自由评论》杂志率先发表文章，响应“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对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张作了比较，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转向的标志，并列举了所谓中共政策转向的五大标志：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

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

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

张东荪尤其强调：“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

张东荪为此热情洋溢地欢呼：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姑不论张东荪对中共既往政策的概括是否完全准确，其对中共当下政策调整的描述确实非常到位。

因应着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至此揭开了序幕。

### 一个人人自危的局面在张闻天为总书记的时代结束了

重大战略转折首先表现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地方党组织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张闻天、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常委随即分成两路，毛泽东率部队去前方，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驻瓦窑堡。当事人郭洪涛多年后回忆：

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



以外,由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

五人小组迅速查清了问题,于当月释放了关押在瓦窑堡的刘志丹等十多位陕北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亲自主持为刘志丹平反的大会,并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从富田事变起,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衍为风气,肃反扩大化步步升级,使苏区蒙受惨重损失。长征路上,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肃反扩大化暂时消停。但到陕北根据地之后,在站稳脚跟之后,肃反扩大化会不会卷土重来?这是党内许多同志所关切的。以刘志丹案件为标本,张闻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这无疑搬掉了一直压在党内几乎所有同志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张闻天手中结束了。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中,延安几乎就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

张闻天不只致力于平反党内的冤假错案,在他看来,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同样不许“整人”。1936年1月27日,张闻天主持拟定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他在文件中要求“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根本纠正过去宣传的“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杀尽地主富农”等错误口号。在社会上乱捕乱杀,是极左统治的症候。四川通、南、巴曾经是张国焘的大本营,现在一些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记得,张国焘治下的通、南、巴,杀人是一

件随便的事。只要谁被指控为地主或是其他坏分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核实,马上就可以拉出去砍头。这种恐怖风尚,在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中,再没能回潮。

这种政策调整,具有革命性意义。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理念自此在延安逐步发育。

##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战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占据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独裁话语。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1931年,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六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政权,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人民只有服从国民党才能享受公民权利,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

国民党的独裁话语,遭到国统区知识阶层的强烈抵制。张东荪认为,国民党训政理论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所要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结



1942年4月,鄂豫解放区第一届参议会主席团合影

果,显然是失败的。

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反省,把内忧外患完全归结为它的敌人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破坏的结果。举起右手打倒共产主义,举起左手遏制自由主义,成了国民党当局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从30年代起,蒋介石就开始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一家上海媒体就这样呐喊: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一位御用学者也赤裸裸地公开主张:

“中国需要有钢铁一样的领袖,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国,这样的领袖我们应该用热血去拥护,是忠实于三民主义的独裁的领袖。”

法西斯主义主张,无论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还是在精神、道德领域,国家都要居于领导地位,“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应给予一种具体的意志和权利,以便制裁一切,统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们主张“实行组织坚强、行动活泼的民族独裁政治,即实行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强力执行三民主义。”

经济方面,他们主张统制经济,即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主导经济发展。

文化方面,他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他们认为,应该反对和扑灭的文化,不仅包括赤色的共产主义文化,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以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一类“陈词滥调”。甚至还包括“个人团体观念”、“乡土观念”、“家族观念”。

为此,他们要求建立严密的组织,首先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党员不论参加文化工作与否,均不许有非组织或自由的表现。“党内完成了文化统制的基础,再在社会各文化组织内建立党团组织,使文化在党内的统制影响扩大到党外,可以更进而完成全体国民的文化统制。”

他们强调:在所有方面必须加强控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低落,不少社团都操纵在民主的棍子手里。这种虚伪民主现象,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致命伤,同时在文化上也是一巨大的障碍物。中国如果要发动文化统制运动,对于社会各

层的社团统制当然也不能避免。”

总之,将中国变成国民党独占的中国,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统,不容一丝一毫的异质,但凡拒绝为法西斯所同化,必为异己,必予斩草除根。他们露骨地扬言:“凡有主张一切反动文化的人和物,当不惜代价使之破坏消灭”。“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从所谓“三民主义”向着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构成抗战前夜国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趋向。

## “民主共和国”当时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

那个时候,与国民党的趋向相反,以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乱捕乱杀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就是一个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民主思想极浓厚的领导人。“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恢复党内民主,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先生说。毛泽东对此也有定评,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是中共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毛泽东并戏称张闻天为“明君”,说洛甫(张闻天)很民主,不争权。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开始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是朝着政权开放跨出的第一步。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



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郑重宣布:

“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进一步承诺:

1.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2.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启动,持续十年的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正式终结,陕甘宁边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实战阶段。

**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拉拉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拉拉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

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赖,让何方回味无穷。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国民党当局对此很不服气,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激怒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立予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新华日报》特别强调: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显然,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边区的普选,后来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周恩来统计,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立健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对边区民主建设,毛泽东有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世界学联代表团:



1941年，晋西北解放区离石县群众参加政权选举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最后道破天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他说：

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联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

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的心声。在这一点上，中共与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取得了共识，奠定了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兑现承诺，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甚至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宪政意识大觉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抗战之前属于禁忌范畴的词汇，从此浮出水面，成了流

行的关键词。救亡并未湮没启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启蒙，提升了启蒙，救亡运动同时构成了空前规模的启蒙运动。

而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边区成了抗战与民主结合的典范，成了宪政的雏形，因而备受瞩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 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民主是边区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边区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这种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1941年，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对此有过阐述。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



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偏于一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共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尽可能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体保护。

中共是一个工农政党,维护工农利益从来争为人先,这方面不会有问题。人人平等、一体保护,重点和难点并不在此,而只在于如何同时维护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的利益。所谓持平、均衡和中立,主要就取决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等在苏区历来是消灭对象的中间阶级、剥削阶级,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与工农合法权益同等水准的维护。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政策调整,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以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同时宣布,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边区大门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敞开,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正式发布。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政府必须持平,均衡,中立,是“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决定”强调,“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至此完全确立下来。这在法制上亦有体现,作为边区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为例证。

在对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对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有过精彩说明。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间阶级

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从毛泽东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均衡的、混合的社会体制。它不是偏于一方,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冲突;不是利益独占,你死我活。而是包容,妥协,兼顾。它是理性的,务实的,是切合人的通常心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的,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经济体制,国营企业,私有企业和个体劳动多元并存,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政治体制,政权向着社会各阶层开放,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同时是一种以开放、多元、包容为特色,接受、吸纳人类主流文明的融通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当时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是被融通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正是融通文化,最终使延安成为圣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

社会主义者当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延安则是专制大一统格局下的民主奇葩。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延安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对他们也不乏吸引力。

就连抗战前一直亲蒋反共的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这时也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共产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者。他因此开始接近中共,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融通文化也赋予中共以强大自信。毛泽东曾自豪地对美国外交官说：“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正是基于强大自信，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诗意地欢呼：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 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国民党当局极为尴尬。既然中国可以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呢？

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资源因此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民党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就试图要给全国人民一个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训政六年，那么时限将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个说法吧。国民党当局不含糊，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法西斯主义，毕竟，三民主义不可能构成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只有引进法西斯主义，才能为他们继续独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资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继成为那时国民党当局的唯一精神导师，国民党当局当时是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的。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招玩不转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主义这时已完全破产，即便在中国也是人所不齿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差不多淘空了。

本来就弱不禁风，这种情况下，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一击。

国民党当局必须应对，无可逃避。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中国之命运》，自然举

世瞩目。但可惜，它并没有能够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荣光——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即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来置换国民党当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义，以此为国民党注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中国之命运》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在蒋介石笔下，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艳若桃花，但他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如此伟大光荣，那么在西方文明东渐之后，它为什么那样的不堪一击，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呢？

接下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通盘解说。把近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其鲜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是为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挖空心思为国民党脸上贴金，无非是要论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只有国民党解释的那种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果不其然，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蒋介石宣称：

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龙身至此挥就。《中国之命运》下面这段话，就属于画龙点睛了——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党即国，国即党。党天下理论因此天然合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非但不法，而且不义，自当人神共愤，天下同讨。



这篇文章如果出在国民党南京建都之初,还不至于令人吃惊——那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低潮期,也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的低潮期。那时出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话语环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抗战末期)就国际环境而言,自由民主因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来越汹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环境而言,则有国统区宪政运动的迭次高涨,尤其有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示范。这种情况下,公然以一国最高元首之尊,一党最高领袖之尊,出而为一党专政辩护,出而与自由民主对抗,其颠预,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势,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国之命运》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共和所有民主人士痛打。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批判。在蒋介石笔下,国民党一党专政简直就是中国人民之福。事实却印证着他的荒谬。就在《中国之命运》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河南人饿死了300万,广东人也饿死了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之命运》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社论标题可说是对中国现实极为精当的写照。

专制不仅是最大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国耻。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老大积弱的形象,抬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多少赢得了一些尊重。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因应着人民大众的强烈呼声,没有因应着世界潮流的巨大变化而有丝毫改观。国民党的专制就意味着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就意味着奴役,就意味着野蛮。所以,国民党的专制国家在国际社会不可能真正有地位。蒋介石欣欣然于外交胜利,比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比如联合国创始国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这些胜利并非专制之功,而是几千万同胞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高层次的腐败闹剧在他身边不断发生,而他一筹莫展。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

无能成了国际笑话,以至于丘吉尔总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罗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蒋出任东方战场最高统帅;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乃至绝望,反复呼吁美国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国民党。

所有这些,无疑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资源。尽管国民党当局在硬力量上暂时处于强势,但在软力量上,即道义上,已接近破产。《民主的才是合法的》,这是《新华日报》1945年2月的一个社论标题。中共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撑腰,当然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向着国民党当局叫板。

基于同样原因,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宣布: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中共高举起民主的标杆,自由的标杆。国民党当局无词以对,处于绝对下风了。

一个是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转向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最终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义上砥柱中流。

一个是抗拒人类主流价值,固守特权,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独占、单一、排他的传统政治格局,最终从所谓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为天下侧目。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至此,大局定矣。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先生和雷颐先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小龙先生诸多启发。在此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吴 思)

#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

## ——杜导正同志访谈录

● 徐庆全

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2005年11月15日溘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但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缅怀,去承继。

2005年12月初,与任仲夷有较多交往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

徐:听到任仲夷同志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您与任仲夷交往较多,您如何评价他?

杜: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联合署名,由朱厚泽与于光远秘书胡冀燕带到广州去与任仲夷告别。挽联请李锐同志执笔,是这样写的:“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这应当是我们大家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

徐: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这样的评价的确是涵盖了任仲夷的政治品质。

杜: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面临



任仲夷

着破除迷信和平反冤案两大根本问题。在中央,胡耀邦是走在前面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同志的统帅,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支持,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的“诸侯”中,在辽宁省任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是冲在前面的;后来,他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智慧和勇气开拓进取。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改革开放,勇当先锋”四个字是很贴切的,不夸大的。

改革应当是全面的,经济和政治要同步进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步子很大,也很成功,

可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滞后,更确切地说是有些“跛足”的。这是现实。任仲夷无论是在任上,还是退下来,对这个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热切地鼓与呼。所以,我们有“自由民主,高举大旗”的评价。

### 对“两个凡是”、对张志新案显现出非凡胆识

徐:您何时认识任仲夷的?

杜:我与任仲夷认识,有一个过程,先是不知其人,后来闻其名,再后来有了接触;接触多了以后,感受也多了,他的见解让我对他产生了崇敬之



情。

1977年,我从广东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任职时,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对于各省的领导人大致还是知道的,但惭愧的是,当时我不知道任仲夷在哈尔滨任职,也不知道他到辽宁任第一书记。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感觉到了他的超人胆识。

徐:您说的两件大事,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

杜:是的。十年“文革”,使我们这些以前盲从的人慢慢地有了些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在生命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一些。对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运作的这两件大事,我是衷心地拥护的,并尽自己的所能进行推动。那时候,任仲夷等一批老同志更是这样做的。

徐: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维与力量是萧规曹随,“两个凡是”;一种思维与力量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两股思维与力量是……

杜:正因为有两股思维与力量,站在哪一方,就需要有胆识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任仲夷的胆识的。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等同志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推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核心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就在辽宁

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

那时我任职的新华总社国内部是各省领导人言论的“大集中站”,任仲夷这些言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产生了好感。

徐:后来任仲夷是“诸侯大员”中最早鲜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一。

杜:的确。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我非常兴奋,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态度。当时,我们总社国内部给各省和各大军区打电话,敦促“诸侯们”一个一个地表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首先表态支持,再就是任仲夷。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



1977年任仲夷(正面右二)陪同邓小平视察辽宁



1982年5月22日,任仲夷(右一)与刘田夫看望灾区群众

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就能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们国内立即发了通稿,转发全国。这时,我对任仲夷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徐:当时,《光明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

章。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杜:可贵的是,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等同志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到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晚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的电话内容。在这个电话中吴冷西同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

徐: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凡是派”同志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

杜:是啊,这正说明斗争的激烈啊。参加会议的任仲夷,以这个电话内容为靶子,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电话内容)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针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这是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能够挺身而出,非常不容易,非常让人敬佩啊!

徐:您能对任仲夷心生敬意,说明你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杜: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

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

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社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当时亦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辑组。“内部参考”编辑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社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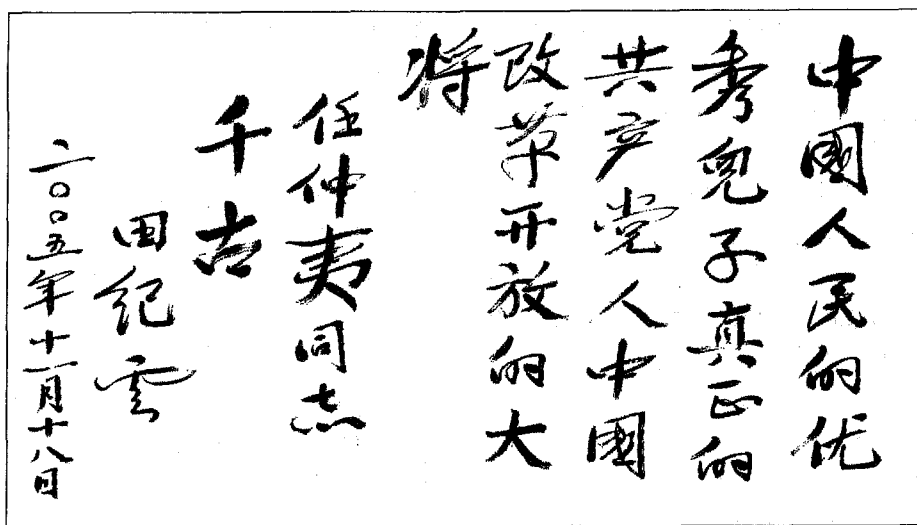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



1992年任仲夷与家人在广东清远





田纪云在吊唁任仲夷现场会上题写的挽词

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很难打开。前面说过，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少数同志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不满意，诸多责备甚至刁难。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仲夷退下来时，跟老朋友们说我是“安全着陆”，此话是话中有话，含有辛酸啊！

徐：您在广东工作了

20多年，是老广东了，对广东当然关注；而任仲夷又是您敬仰的人，想必您是一直关注着广东改革开放的。

杜：任仲夷到广东的5年，大致是我在《光明日报》任职的时间。有你说的两个渊源，我确是很关注广东的情况，任仲夷在广东的作为，也大致是了解的。我先跟你说说被很多媒体忽略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任仲夷在广东对包产到户的推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年9月为此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我的老朋友，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林若、杜瑞芝告诉我：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

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杜：就因为任仲夷在这两件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我“认识”了他，从那时起，在我脑袋里，任仲夷的形象就鲜明起来了，突出起来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引为同道的，对他关注也多起来了。

## 艰险的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徐：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后，中央希望广东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这在当时需要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想，中央调任仲夷任广东第一书记，肯定是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的。

杜：当然是这样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

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徐：任仲夷1980年到广东工作时，从大背景上来说，不是很有利。稍后，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杜：你说的问题，的确是任仲夷到广东任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它的起因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读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认为，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徐：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如何做的问题。

杜：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任仲夷跟老同志谈得比较多。他说，当时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

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徐：任仲夷还有句名言，很能说明您说到的这一事例。他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杜：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徐：那时，也有同志搞点小动作对广东进行责备甚至刁难。我记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表出来了。当年不懂，现在回头看，文章适时而出，矛头是直指广东经济特区的。

杜：当年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不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形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



2004年底,任仲夷(中)、田纪云(右)与杜导正在一起交谈

的行动者啊!

## 至死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

徐:关于任仲夷在广东5年的情况,您叙述的全面了。我还想知道的是,您什么时候“见其人”的?

杜:我和任仲夷第一次见面,是他退下来以后,更多的接触还是到90年代我主持《炎黄春秋》工作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他是兄长,我是小老弟,但我们几次长谈,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徐:任仲夷晚年最专注的事情,我看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您主持的《炎黄春秋》杂志也一直非常地关注这个问题。

杜:任仲夷,包括党内外一大批同志,也包括我,都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坚定的、衷心的拥护者。关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任仲夷曾有过一个概括。他说: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

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地、有力地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有人说我们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够协调、不够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能否更好前进的一个关键问题。我非常同意任仲夷的这一论断!

徐:小平同志1986年6月28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

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这是真理!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跛足”的改革现象呢?

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老同志和任仲夷也几次交流过意见和看法。小平同志对我国政治改革有许多精辟、科学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是正确的、精辟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论同样也是正确的、精辟的。改革之初,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事实上,上世纪尾我党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确实为我们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他可能担心搞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乱。其实,正像任仲夷说的,我们稳步地推进政治改革不会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继续安定,但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我们的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稳步地进行



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

徐：我注意到，任仲夷的几篇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都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说你们志同道合也好，说相互激励也好，总之，你们晚年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杜：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一大批同志，是一股力量。凡真心支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们交往过程中，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近年交谈最多的话题。任仲夷近年写的这几篇文章，往往交给我。

去年七月份，任仲夷接受人采访，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老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专门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了推进民主政治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搞“试验田”。他说：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第二个方案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好像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仲夷说的这两个方案，在交谈中他几次提到过，但现在系统地提出来，的确很精彩。至于说这是“政治遗言”，恐怕说得伤感了些！

徐：听说任仲夷这篇长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时，你还是有所删节的。我看到广东的一家刊物也发表了任仲夷的这篇文章。任仲夷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

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这种做法，我以为，我们也可以参考的。

杜：不管怎么说，任仲夷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谈到中国的改革，我爱用“跛足”这个词。如任仲夷所说，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协调发展”？任仲夷的见解非常正确，我非常赞同。他说：科学、协调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同样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就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可能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徐：人生不过百年。任仲夷去世了，让人悲伤，让人惆怅，但我觉得他留下了“政治遗言”或者说是政治遗产。所以，我们不必有遗憾。因为他的勇气没有老去，他的智慧没有老去；因为这是一个不曾结束的时代，这是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

杜：任仲夷离休之后，见他的人都习惯地说句祝他健康的话。任仲夷总是纠正说，不要健康，要“天天向上”。他的确是在“天天向上”，一直都在不懈地前行，继续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排头方阵里的一个兵。我同意你的话，任仲夷去世，我们不必有遗憾，但我们更要牢记孙中山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像任仲夷一样，“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续以大智大勇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推动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对任仲夷最好的缅怀。  
(责任编辑 徐 孔)

# 我与耀邦共事

● 李 昌

耀邦与我初识,是在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党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按:此机构成立于1938年11月)听取各个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为中央的相应指示准备意见,大约每两周开会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耀邦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也是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经常见面。其实,这之前的1938年9月我第三次到延安时,就已听人说起胡耀邦,知道他在苏区做青年工作,曾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他作为红军青年干部,年仅24岁就担任军内要职,深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器重;后来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担任政委,在延安青年干部中很有影响。我们认识后,由于我对苏区青年工作情况了解不多,常常向他请教,而他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也满怀兴趣,问起“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各种细节,一谈就是半天,我们五十年的友谊从此开始。

## 在战争中沐弹雨建铁军

1946年6月,我奉调担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后改编为解放军第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即前往纵队驻地山西阳高县,耀邦那时是纵队政委,两人又走到了一起。从那时到1947年7月他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委为止,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短短一年多的相处,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华北战场炮火纷飞、战事频仍。1946年9月,四纵在绥远省集宁围城打援,傅作义调动四个骑兵师以及其他精锐部队猛攻我军阵地,我军奋勇阻击,双方都打得顽强,战斗惨烈。那天我随他到前线视察,

我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忽然有敌机从山后扑来,机枪哒哒,弹如雨下,耀邦端在手里的瓷碗被打得粉碎。战士急忙拉着我们钻入防空洞避开敌机的袭击,这才发现他的大衣穿了个洞。我说“好险啊”,他却满不在乎,镇定如常,该问的问,该说的说,视察照样进行。耀邦作为军政委深入前沿阵地,在战场上处变不惊、无所畏惧的军人气概,对指战员的信心和斗志是极大的鼓舞,而我有幸在他身旁,得以亲眼目睹。集宁一战之前围攻大同以及此后的历次战役中,耀邦总是不避危险,亲临前线,很快就赢得了战士们的衷心爱戴。

解放战争初期,敌人来势凶猛。1946年的华北战场上,张家口在傅作义骑兵奔袭下失守,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张家口是侵华日军在晋绥地区的最大兵站,囤积了大量物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张家口得而复失,战士又惋惜又抱怨,而敌军貌似强大,还在步步进逼,部队情绪低落,跟不上党中央军事战略思想:“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当口,耀邦在灵丘县召开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分析了形势。他指出: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什么了不得。敌人以全国人民为敌,孤军深入,每占一城一地都要分兵把守,兵力分散,被动挨打。我军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人民群众支持配合,失去张家口当然痛心,但反而卸去包袱,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一部一部歼灭敌军。耀邦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5个月,就被我们歼灭了39个旅,再歼他两个39个旅,战局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张家口能够失而复得,更大的城市也能一个个解放,北平、天津、上海,都不在话下,这才是真正的了不得。这条由后来的战争

历程——验证的军事路线经过耀邦深刻而生动的分析，干部心里亮堂了，传达下去，战士情绪迅速恢复和高涨。他们把耀邦政委的讲话编成顺口溜，“两步并作一步走，歼敌三个三十九”，在军中传唱。部队转入休整练兵，随后投入了平汉路北段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耀邦高瞻远瞩，这段时期表现在部队建设上。早在解放战争初期的1946年，我军还处在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阶段时，他就看到了我军现代化的前景，预见现代化必然要求我军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于是因陋就简，从头抓起。这里两件事值得记忆，一是大力支持政治部创办铅印的《前卫报》。

我党从来重视宣传工作，而报纸是宣传的重镇。野战军运动作战，驰骋山区平原，报纸必须流动。为此创建了流动铅印车——先是一辆马车，后来又增加了一辆，装载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编辑人员也都配备了马匹。纵队还为《前卫报》配备了电台，随时接收前线电报，抄录新华社新闻广播稿。根据耀邦的意见，由他和我分任正副社长，都为《前卫报》写稿，帮助选用新华社电讯稿件。按照我们商定的编辑方针，报纸少发社论，多写连队讲话材料，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纵队首长指示精神，结合纵队实际快速发布军事、学习、生活方面的信息，大力表彰英模，宣传立功受奖活动。报纸大受战士欢迎。为了及时把

报纸送到战士手中，纵队为发行工作配备了四个骑兵通讯员，有的部队还是等不及，索性派出骑兵到政治部来取。从1946年底到1955年，这张报纸办了八九年，冯征、王惠德、沈定华以及和谷岩等同志都曾当过主编。

另一件事是编印出版《人民军队三字经》。《前卫报》分发下去，有的战士自己能读，有的战士只能由别人给他念。针对他们不同的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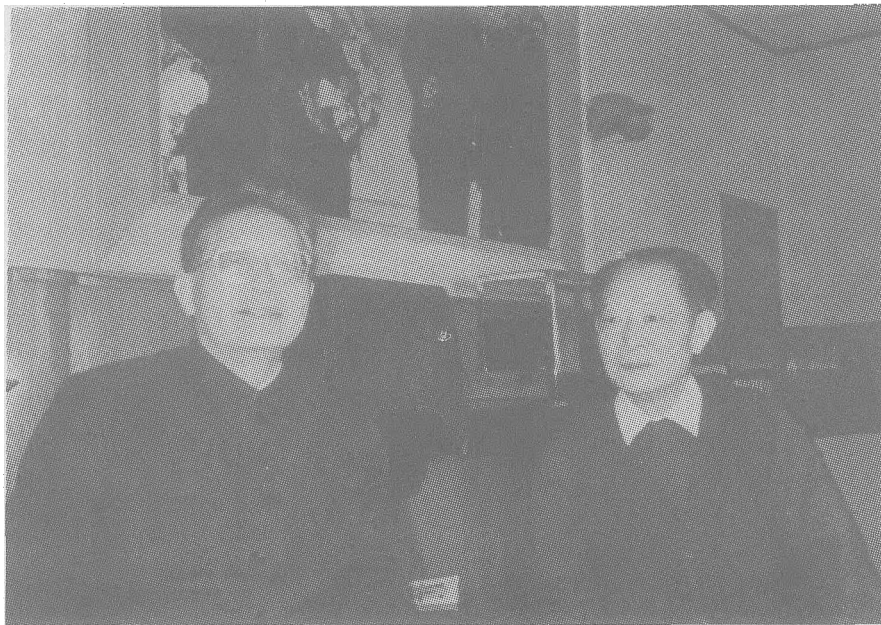
要，耀邦和我商量编写一本启蒙读本，把识字和政治教育结合，要求内容充实而语言生动活泼、通俗顺口。课本编写了两次，第一稿不满意，没有通过，第二稿就交给和谷岩编写。和谷岩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耀邦鼓励他放开胆子下笔，结果就是这本《人民军队三字经》：“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从人民翻身讲到共产党、毛泽东和朱德，从大革命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讲到美国和苏联，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到奋勇杀敌、立功受奖、优待俘虏。《三字经》起初在《前卫报》连载，全部完成之后，耀邦和我修订了两遍，又让部队画家郑拓配上插图，然后印刷出版，全体指战员人手一册。《三字经》深受欢迎，一章章一段段许多战士都能背诵出来，被当顺口溜演唱。《三字经》被不少战士随身携带，在伤员血染的衣袋和烈士遗物中都曾发现。

人们不尽知道，平日的耀邦乃是一位恂恂读书人，从初中文化水平出发，从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危途一路走来，始终勤学苦读、博览群书，成就了他的渊博知识而又通情达理。耀邦的勤奋，在晋察冀军区四纵队共事这一段我也得以亲见。每解放一座城市，他都要收集历史、地理等各种书刊，一路行军总是带着书籍在马上阅读。他的读书习惯使我深受感染，也给干部战士树立了榜



1946年6月，胡耀邦（前左一）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李昌（前中）任政治部主任，陈正湘（后中）任司令员





1988年2月14日,李昌与夫人冯兰瑞前去看望胡耀邦,冯兰瑞为他们摄影留念

样。四纵文化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中取得的成就,乃至这项工作的启动和发展本身都离不开耀邦政委本人的体验和示范。

耀邦如何大力支持政治部的工作,除上举者外还有一事值得回顾,那就是四纵开展的立功运动。我和耀邦多次交换意见,认为部队政治工作是深入持久的任务,需要说服教育,也需要一个恰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并行才能全面提高士气。人类一切行为离不开激励机制,带兵打仗尤其不可违背这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于是根据政治部的建议,四纵于1946年12月以在部队开展立功运动为主题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耀邦亲自起草《立功运动条例》,在会上征求意见。经过热烈讨论,归纳总结了指战员的各种建议给《条例》定稿,对实施和评选奖励办法作出了具体细致的部署,并决定用缴获的金银铸造奖章,奖励立功官兵。接着,各个旅、团、营、连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有功必奖、多功多奖”的口号深入人心,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很快在四纵形成高潮。

1947年1月打响的保(定)南战役,就是开展立功运动的第一个战例。1月28日拂晓总攻开始,四纵勇士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攻到定县城下。冲锋号吹响了,突击队的勇士们胸挂冲锋枪、手持手榴弹攀登云梯,一拥而上,把红旗插上城垣。主力部队相继攻入城中,歼灭了残敌。四

纵传令嘉奖三十二团的尖刀八连,陈正湘司令员、胡耀邦政委授予八连立功奖状和“登城先锋”锦旗,突击班班长王祥海荣立特等功。1月29日中央军委来电,嘉奖四纵。陈正湘司令员说:政治部的工作做得好啊!部队的精神面貌和过去真是大不一样了。这是对政治部、也是对耀邦工作的充分肯定。

### 在团中央共患难

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不久之后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直到我任团中央书记时他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才又走到一起。那是1952年秋天,建国已经三年,党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总体情况和个人身份都与战火纷飞的岁月大不相同。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仍然是党团干部最根本的要求。这根本的一条人们未必都能做到,耀邦却模范地身体力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四纵一段岁月更深。

这段时期有一件往事难忘。1953年6月,(中国)青年团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耀邦做工作报告,我做团章修改报告。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报告后来都得到了毛泽东主席肯定,称赞“写得不错”;而这两个报告都曾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埋下祸根,事过十三年文革爆发,这几个字的删节成了耀邦和我的弥天大罪。我那时在国家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和耀邦一起被造反派揪回团中央礼堂批斗。造反派厉声质问我,为什么竟敢从团的工作报告、团章以及修改团章报告中删掉“毛泽东思想”。耀邦推功揽过,把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却再也想不起事情的由来,而造反派不依不饶,连连追问。逼急了,耀邦就说:“你们去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恼羞成怒,把他斗得更狠。

其实,无论从原则还是从具体情节来说,耀邦这话都是绝对不错的。当时我听着造反派对他

逼问,就回想起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告诉造反派,“修改团章报告和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掉的。这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派陈伯达来帮助我们起草文件,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毛泽东思想’就不要再提了。”毛主席自己的话总得听信罢?这才解了围。押出礼堂时我们在礼堂大门口相遇,耀邦面容消瘦憔悴,和我互相注视,默默无言中传达着彼此的关切。

这事耀邦后来也想起来了,此外我还想起了陈伯达作威作福的丑态和耀邦的愤怒。陈伯达那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权势显赫,架子极大,根本不把团中央放在眼里,一味指手画脚。每次来到团中央,把报告接过去看几眼就随手递回,指摘这不行那不行。有时说毛主席不满意,有时他把报告带回去,不知看了没有,反正一个字不动就拿回来,还是要改。耀邦和我把自己整天关在团中央办公室里,改过来改过去,改得身心疲惫,愁眉苦脸,陈伯达依旧挑剔不断。终于有一天耀邦发火了:“毛主席让他协助我们改文章,他整天只知道指手画脚。不管他怎么说,老子就是不改了,就这样定了。”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删除的话,就是在这之后告诉我们的。团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接见耀邦和我,“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嘛”这句话,就是这次见面时说的。耀邦和我听了相视而笑,陈伯达的事却没有敢告诉他。

和在四纵时一样,我和耀邦密切配合,整顿团的工作作风,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迅速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

## 在中科院同刮“翻案风”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代周恩来总理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7月,小平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文革”时期,中科院一开始就是重灾区,到70年代初,科学院71名司局级干部中有59人被打倒或被重

点审查,处级干部也有半数以上倒台。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170位高级研究人员,其中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被迫害致死者达229人,其中为中国卫星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一代科学巨匠、著名科学家赵九章死得尤其惨。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17年的工作被彻底否定和批判。“名利挂帅”、“技术挂帅”、“专家路线”、“知识私有”的帽子满天飞。“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代理人公开宣称知识分子“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江青、陈伯达甚至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横扫”给中国科学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面对这一片混乱,小平决心坚决整顿,把耀邦和我派去中科院,分别担任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和核心组副组长。1975年7月18日我们进入之后,立即根据小平的指示,与中科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和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的指示,以耀邦为首的领导集体反复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指出自然科学既然重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它本身就不包含阶级斗争,在自然科学领域就不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能把科技人员当做专政对象。我们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



1988年3月4日,李昌与夫人冯兰瑞在广州。(田小邑摄)

法,强调重视和发挥科学家在研究和管理上的重大作用,明确研究机构要以研究为中心。耀邦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10月中旬,他在中科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发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号召。他的生动率直的语言、热情洋溢的号召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

9月26日,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汇报提纲》)的汇报。《汇报提纲》由耀邦主持撰写,我协助。按照耀邦的设想,由我、王光伟、胡克实等分工起草,再由耀邦分章分节、逐字逐句定稿。一共写了六稿。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熟悉科学工作的于光远的帮助。提纲就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成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科院的组织机构、人员、工作状况,就我国的科技路线、科技战线的任务以及中科院的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等等提出意见。小平边听边插话边评论;许多话一语破的,发人深思,气氛热烈。有关的报道传达出去,人们耳目一新,看到了希望。

提纲经过反复修改,去掉一些太尖锐的话,送交毛主席审阅,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横加批判,污蔑这个提纲是邓小平反攻倒算、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他两株一是《论总纲》,另一是《工业二十条》),拿出来批判的是耀邦主持起草的第三稿。耀邦和我都被停职反省。回顾起来,我们到中科院这段工作前后不过四个月。

1976年7月,耀邦和我被中科院造反派揪到大连化学所,要在所谓“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但人心不服。这时耀邦病重住进医院,医生坚决抗议造反派要他到会的命令,严正声明谁要粗暴劫持,谁要违反医嘱,一切由谁负责。造反派惯于放肆,迫害他人从不手软,一听要承担责任就软了下来,只得悻悻而去。我的批斗会群众不乐意参加,开得也很不成功。又一次,造反派哄

骗人们说是看电影,及至宣布是开批斗会,人们一哄而散。

## 在改革开放中互相支持

“四人帮”粉碎后,我恢复工作,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和主席团执行主席。1982年我68岁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退居二线。耀邦这时已经担任党中央主席,他提议我到中纪委工作。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工作上继续得到他的支持。这里只举一例。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后,农村普遍办起了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党员干部办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雇工现象。对此,1981年10月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允许经营者有两个以内的帮手,有技艺的可以带五个学徒。部分群众对超标准雇工反映强烈,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超过了七人就是剥削,是党员的就要除名。大量来信反映到中纪委。1984年2月14日中纪委常委开会讨论。会上,绝大多数常委认为雇工就是剥削,主张开除超标准雇工的党员。我则反对开除超标准雇工的党员。我认为雇工是农村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刚刚有所发展,就要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会动摇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党失去广大农民的信任,不利于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按小平同志说的“看两年再说”。我没有向耀邦问起过这件事,但书记处会议由他主持,相信他是支持我的意见的。

1987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后,1988年春节前夕(2月14日),我与老伴冯兰瑞一同去看望他。进入客厅还未落坐,耀邦就迎了上来,冲着我老伴双手作揖,开玩笑地说:“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耀邦与冯兰瑞也是老朋友,每次见面两人总喜欢开点玩笑。然而,在这次玩笑的背后,却可见他在



辞职后的复杂心情。我当时就对耀邦说：“冯兰瑞不是什么英雄，你也不是狗熊！”耀邦接过话说：“看来我是检讨过头了……”耀邦指的是辞职前在生活会上那次违心的检讨，此事一直让他懊恼，我则始终认为耀邦的辞职是被迫的。我们坐下后，耀邦又神情严肃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帮我考虑考虑后半辈子做什么事，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耀邦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受了莫大委屈也不忘记人民。这一天，我们交谈得十分愉快，冯兰瑞还为我们拍了照。想不到，竟成了我与耀邦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9年4月16日，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去世了。我不敢相信。随后到来的胡克实证实了这一噩耗。说耀邦同志确实逝世了，他刚去过医院。对我来说，这简直如同一声闷雷，震得昏头胀脑。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把噩耗告诉老伴冯兰瑞。她一向刚强，也不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天下午，我们前往府右街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四合院内放着两张签名桌，灵堂中央是耀邦遗像，四围摆满了花圈。当中花圈绢带上写着“李昭率子胡德平夫妇和胡德华夫妇敬挽”……耀邦真的走了，我们只能对着他的遗像深深鞠躬。我们是来吊唁并想安慰

李昭的，自己却有点控制不住了。

耀邦只活到了74岁。无论怎么说，就其壮怀激烈的政治理想，以及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需要来说，他走得太早了！耀邦是我党的卓越领导人，尤其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转变时期，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我们党最好的时期之一，而耀邦功居至伟。我们看见的耀邦无私无畏，时刻把国家和人民之急放在心上，身体力行，他是一位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的政治家。特别是耀邦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其高尚品格将永标史册。

4月23日，我和老伴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面对鲜花丛中覆盖着中共党旗的老战友，从此天人路隔，不禁隐隐心痛。从大会堂出来，目送着灵车沿着长安街缓缓西去，两旁站满了送别耀邦的人群，一如当年为周恩来送别的感人场面。

（作者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抗日民族先锋队队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共青城的思念

● 万绍芬

编者按：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特刊发《共青城的思念》一歌的歌词，以兹缅怀。

一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鄱阳湖畔长满荆棘；  
你风尘仆仆走进茅棚，  
为“棚友”带来温暖和勉励。

又是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共青城拔地而起；

你兴致勃勃漫步街头，  
和“垦友”共商未来大计。

还是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敷阳山悲痛沉寂；  
你屹立在松柏丛中，  
凝望共青城迈向新世纪。

朝气蓬勃的青年导师啊，  
共青人永远不忘你。  
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啊，  
亿万人民永远怀念你。

注：胡耀邦同志三次来到位于江西省的共青城，都是在冬季。第一次是1955年冬，胡耀邦同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第二次是1984年冬，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第三次来临是1990冬，他长眠在共青城敷阳山。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原书记）

#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 王 泓

读了季羨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很赞成，他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

## 我是亲历者

我自己可说是大跃进的“亲历者”。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曾几次去河南、河北、天津、安徽、江苏做过调查研究，又是万名干部支援农业队伍中的一员，在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后改为区，下属八个小公社）担任过两三年的公社书记或区委书记。我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公社化、食堂化都成了危机。这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阵地，一定得保住，也要解决群众的困难。为什么会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天灾，

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这一条。我们下去原来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一是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二是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三是恢复农业生产；四是处理各种“大办”的遗留问题；五是维护食堂化。食堂要办好没条件，要坚持就不能制止饿死人，要解散又不许。总之所有工作之难、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我自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说我是个受害者呢？因为大跃进初期，我几次下去调查研究，结果都不好。例如到南京看大炼钢铁，见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将学生正在使用的原国民党中央大学等校留下的小钢丝床、院墙铁丝网都炼了钢，结果变成一堆堆烧结铁、废物。我写报告说，炼钢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不该有用变成无用。特别是很多学生还在打地铺，国家还得花钱给学生搞床睡，又是一笔浪费等等。于是这就成为我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对我的，看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戴定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反右倾”突然停止，对我也就不了了之。

又如一次去河南调研，随便了解某大学毕业生分配情况（那时周总理确定大学生毕业分配由三个部门管：计委管计划、教育部管调配、人事部管调整），谁知该大学竟自作主张停止分配工作，要大学毕业生都回家劳动，并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搞得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大闹。怎么办呢？对此，我只说了两句话：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听到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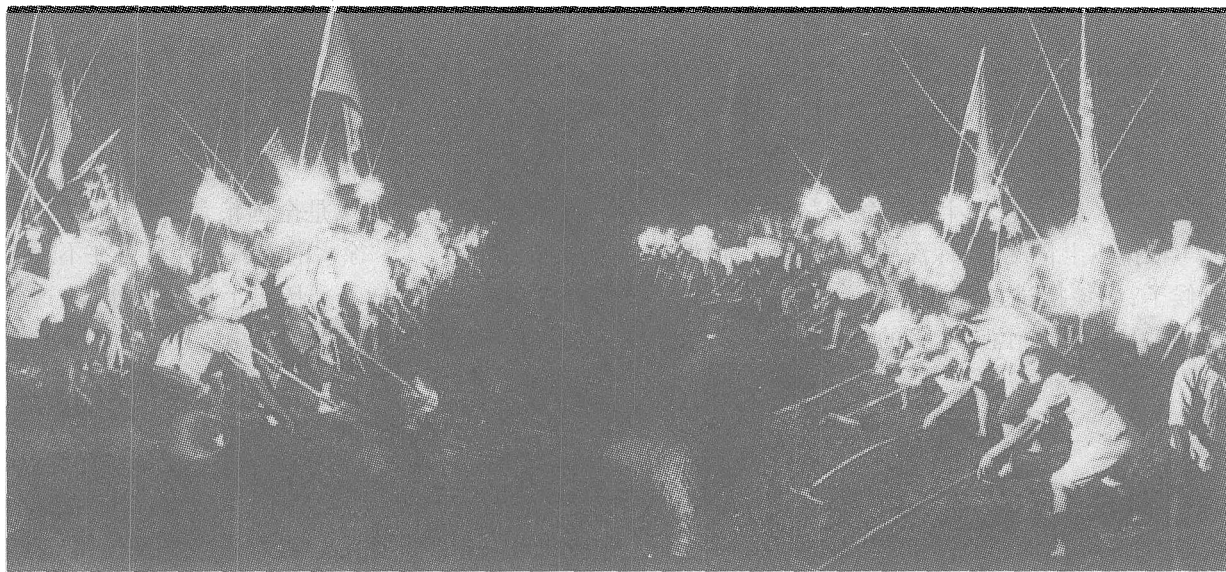
示；你们要搞，工作要注意做细，不能出意外问题。可是我还没回来，告状信已经来了，说我下去指手划脚，给大跃进、新生事物泼冷水。这信多亏落到我的一个领导王汝之手中，他给压了下来，未做任何处理。不然也成了我反对大跃进的罪状。

再如我和老领导张北华（原为计委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宋平为局长。第一次成立国家经委时，计委一分为二，我和张一起到经委，他任干部计划局局长）去天津参观水稻的大卫星。到地里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是把二十多亩地中快成熟的稻子合并移栽到一起造成的（各地都出现这种办法）。由于挤得太紧，上边装了许多大灯泡照明，下边用鼓风机吹风。张是一个只说实话的人，他在地里就说：“这是胡闹，算什么卫星，非减产不行！”出了稻田刚上公路，就碰到几个拉车担扁担的人，带铺盖锅盆碗筷，他要停下来去问问是干什么的？他果然猜对了，是山东逃难出来的。他是山东人，当即表示：看来我们山东政策出问题，农民故土难离，怎么这时还出来逃难？！他看到经委北门外也搞土炉炼钢，便摇摇头说：“怎么我们也这么搞，这能炼出钢来吗？！”他将他的看法，都对委领导作了汇报。结果，很快调往甘肃，听说他在甘肃又是老说实话，被反复折磨致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被调回计委。

回计委不久，又被暂调国务院科技队伍规划办公室。这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影响

到国务院食堂。我在那里还占了点便宜：一是口粮定量时，给周总理也评了定量，由于他每月有许多顿饭是招待外宾的，把他的粮食定量的一半左右均给大家，给我也涨了一斤；二是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不知从哪儿搞到豆腐渣，每天早上由食堂免费、免粮票供给每人大半碗，很解决问题。大家都很感激这位好秘书长。但好景不长，突然调我回计委去农村支援农业，好像还是多人中挑一似的。不管怎样，是党员，就只能二话不说的下去。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



大跃进时期河南襄城县农民挑灯夜战深翻土地

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就这，我还是性命难保：一次我在思诚村驻村，一天饿得昏了过去，起不了床了，村里请大夫给我诊治，大夫说有危险，但无药可治。她悄悄对村里人说，看样子吃什么东西也不行，他已难以吃下去了。最好弄点鱼汤给他喝，也许有希望。村里几个人商量，叫谁打破薄冰下水库摸鱼呢？人都饿得很虚弱，下水危险也很大，最后几个青年一起去摸了鱼回来救活了我。这件事使我很感动、很难过。吃，感到吃不下去，落了泪。不吃也感到对不住群众的情意，心里也很难受。群众多好呀，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是我又不行了，当地大夫说，那儿还有两支进口葡萄糖取来给注射。谁知这葡萄糖已变了质，注射进去后马上发烧到昏迷状态，一试温度计四十多度到了头。几个大夫都感到束手无策，叫地方准备后事。主治大夫是个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竟然把孩子扔在家里，两天两夜陪着我，坐在我身边痛哭不已。她以为我十之八九不行了，我死了，她也就活不成了。我偶然清醒一点，就赶紧叮嘱地方干部：我死与大夫毫无关系，她是好心，无论如何不能归罪于她。但我命长，终于活了过来。最后还是因我病危被送回北京。

根据以上情况，我深深感到现在到我说话的时候了，应该把过去想说不好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给后世子孙留一宝贵的教训。

## 我的几点看法

对大跃进我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大跃进表面上似是经济的跃进运动，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运动，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很广，我的见解不

一定准确，需要提出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领导。

一、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为时不短的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但人们在谈我国发展历史时则说“58年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似乎大跃进是58年一年的事，完全把三年困难，大量饿死人与大跃进割裂开来。当时说困难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的，既然主要是天灾，还能追究老天爷的责任吗？这样写历史，本身就淡化了大跃进，实际上那几年老天爷很帮忙，没有什么大灾，58年还特别风调雨顺，丰产不丰收能怪老天爷吗？三年困难、死人是跃进造成的恶果，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况且1959年大跃进仍然处在高潮期，许多“大办”并未停止，这一年也是死人很多的一年，60年许多“大办”才有所收敛。因此，把大跃进的下限划到三年困难时期，甚至1963年恢复期都是有道理的。

二、搞大跃进目的何在？我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跳跃式跨进共产主义。这从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直到普通农民都是很清楚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毛在回答彭的批评时也说：对“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当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并强调：“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不少人都到河北徐水县参观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规划。毛泽东视察后非常高兴，还在那里提出要大家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中说“徐水是全国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县。”“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告诉人们徐水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两个，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谈的。她俩的话大致相同，很精彩，很深



刻,大意是说:“我们几个也不知怎么凑到一起的。开始谈现在食堂没粮吃,怎么办?谈着谈着就谈到我们农民祖祖辈辈受欺压,种地吃不饱饭;祖祖辈辈盼来个大救星,救我们能安居乐业,吃饱穿暖;现在大救星来了,大救星就是毛主席,所以我们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现在毛主席要咱们大跃进,公社化,实现共产主义,这还能有错,我们不懂的是为什么搞共产主义就要大糊弄、刮共产风。现在吃不饱饭,是小和尚把毛主席的经念歪了。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的话,他不会让我们都饿死,人都没了,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能干的庄稼活还要干。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饿死也心甘情愿。更要管住孩子,不能因饿而去偷摸,干坏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说明老百姓多么盼望共产主义的到来。大跃进适应了老百姓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幻想,所以也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看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念念不忘我们的终极目标和理想,也会起到动员鼓励作用。问题是那时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左”倾幻想共产主义,而且是混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幻想一步登天。这种错误列宁干过,但不能与我们相比,列宁初试即止,我们不同,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悲壮实践”,因为我们不是小打小闹的试验,而是全国全面的实践,是来真格的。而且知错不改,即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反彭德怀、反右倾,延长了错误的时间。

三、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没有错,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左、右路线斗争史。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但这样讲多了,使人觉得有点公式化、概念化、不实际,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此,我和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广泛交谈过,他们一般的认为:路线斗争左呀右呀的,那是上边领导的事,我们不懂。我们农民讲实际,什么事错了,为什么错了,讲清楚我们喜欢听。不要上面路线斗争,使我们老百姓糊里糊涂白吃苦。因此,有人甚至讽刺地说什么“今反左明反右,越反百姓越糊涂;今

反右明反左,百姓遭殃无处躲。”

那么怎样表达这一错误为好呢?我看还是再学学周恩来 59 年庐山会议前 6 月 11 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批评为好。他说:“1958 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这几句话对这一错误作了高度的概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形象地表明主客观都无限度。这里不由人想起当初的荒唐事来:《人民日报》登出一个女孩(看来已有七八岁)坐在稻穗上的照片;我在基层还看到一幅招贴画稻穗上不是小孩,而是大人在跨步前进,标题则是:《俺的稻子不算好,社员可在稻穗上跑》。

四、所谓“抓纲治国”、“政治统帅经济”、“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这一套方针,在“大跃进”中贯彻得淋漓尽致,破坏性之大,尽人皆知。大跃进中的一切活动,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意义,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冲击了一切。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也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反对大跃进、消极对待大跃进,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河南抓了“小潘复生”又抓“小彭德怀”,搞得不亦乐乎。群众吃不饱饭挖点野菜、搞点树叶等,说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扒了树皮被说成是扒社会主义的皮等等,不一而足,都要批斗。河南的批斗会叫“光荡会”,就是批斗者围一圈,把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有的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搞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尖锐到了极点。据说,这样翻来斗去,都是为了纯洁生产关系。这也是为了要执行最高指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农民不搞农业生产了,被逼得以死相抗,还不是生产力的暴动吗?!“生产关系过度革命,生产力暴动”,这可能就是结论。

五、有人说:“大跃进”不考虑人民死活、不顾及生产发展。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不能说出发点就没考虑这些。想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也好,超英赶美也好,物质极大丰富也好,都是从发展生产出发而提出的。问题是大家的思想都跟

不上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为此还作检讨说：“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生产跃进的发展”，“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国家计委对1958年钢生产搞两本账，一本是必保指标，一本是争取指标，都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甚至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至于死人问题，更是难以预料的事，是大跃进错误造成的恶果。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有的说两千万，有的说三千万，也有的说数千万。其原因：一是非正常死亡，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并非全部属饿死，情况比较复杂；二是上报死人特别是饿死人情况，从上到下都感到不光彩。在基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情况十分严重。他要高产量，我尽可能弄虚作假往高处报。要报人口死亡数，你不愿听我可不报或少报。因此，吴芝圃（我下去时他还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倒说了真话，指示下边：“人口死亡不要调查，查也查不清，越查越多。”三是像我所在的公社那样，后期政权已基本瘫痪，生产队以上干部大都抓起来关押在县里，谁来干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我意今后谈大跃进死人问题，取其中数说个大概就行了。

## 一个公社是怎样“人亡政息”的

我下放担任书记的公社，是河南省叶县旧县公社。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遂平县嵒岈山人民公社，第一个粮食高产卫星也出自他们；毛泽东在河南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唯一的大炼钢铁先进县是河南禹县，等等。

出了叶县县城沿许（许昌）南（南阳）公路下行，不远就见到在我们公社与邻近公社交界处新建了个大公园（这里原是一片大好的麦地）。公园纵横修了几条大道。中间建了凉亭。公园名叫“麦海公园”，这无疑是人给起的。具有麦浪翻风的诗意。再往前到公社所在地附近，一长排新房很耀眼，据说这是公社的工业区，到了公社

（即区委）则见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只这三大件，就使人震惊不已。我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他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社办工业方面，在工业区建了几个工厂，在平顶山搞了个小煤窑。工业区的几个所谓厂子，除化肥厂没有搞成外，已建成的两个厂子简直使人哭笑不得，不可思议。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到这里，办了个飞机厂，没有钢就搜集农民的农具（大炼钢铁时已经收集了不少），据说还真打出一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我下去后，不少铁匠还没遣散回家，住在那里白吃饭。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方向，谁也不敢轻易解散它。另一个工厂是专给牛做牙刷的。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这个厂子我下去时已经解散了。厂房里还堆了许多已做成的牛牙刷，完全是一堆废物。直到我离开旧县时，还没个处理办法。我只得向接替我工作的同志交待说：“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大部分已经处理，没来得及处理的，我提个意见供你们参考。唯有牛牙刷，我不知该怎么办？留给你们研究吧！除此之外，煤窑还有一百多人左右，住在山上，多吃多占社员的口粮，这些人不撤回社员意见很大。但派谁去处理也处理不了。首先上山的农工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回家吃不饱饭，还被折腾。你提出解散，他们给你上纲上线，说什么解散煤窑就是解散社会主义。没法，我去了一趟平顶山，也下窑看了看，事实上他们早已停工，也没条件生产。那个斜井是个小斜洞，一根支撑坑木也没有，爬进爬出背那么一点煤，还很危险。我向他们做通思想工作后，让他们马上解散回家，他们向我提出：几年了，这里什么家产也没有，只有一条大猪怎么办？这头猪大得像头牛。我说，这是你们养的，你们有权杀了它，除了吃一顿外，家里两年多没吃过肉了，还可带点回

去。他们听了简直感激得热泪盈眶。

农业生产,1958年起就处于半停顿状态。丰产不能丰收,好多庄稼都糟蹋在地里。红薯则套犁耕一下,露出地面的大个,捡一个就完了。第二年一年猪总在地里拱,才没饿死。男劳力基本上都调到大炼钢铁、大搞水利等工地去了。剩下的妇女社员很快也患了浮肿病,还加上子宫下垂,基本上不能下地干活了。对此,我问过一些人,我说我也有浮肿病,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不好,把我们的妇女主任逼急了,她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不信你来看我的。说着就脱裤子。我只好赶紧阻止说:“别!别!我信!我信!”那时,种地只是为对付上级检查,只干路边、地头的农活,地中间的草比庄稼高。施肥套辆马车装上有机肥,检查团到了村东头马车飞跑赶到东头,检查团到西头,这车粪又拉到西头,永不卸车。他们把这称作“生产第一线”。

大搞水利,我们一个公社要同时在淮河上游的一个支流上修两个水库。两个可能都算中型水库。一个大点的是在上游建的一个跨公社水库,我们是主要受益公社,派的民工数量最多,我到叶县后,民工还撤不回来。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不小的大坝,只是堆了大量黄土而已,连个溢洪道都没有,白耗了大量民力。不久上面决定这个大坝要扒掉。还未完全建成,又要开始扒坝,民工还是不能撤退,只好当个包袱背起来。另一个社内的水库,我原打算请专家来看看,争取保留下来,后来听说我走后也扒掉了。这两个水库劳民伤财,损失之大,难以估计。

人民公社既然是攀登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就要贯彻“一大二公”的方针,共产风也应运而生。农民特别不理解、特别恼恨的就是这个共产风。他们认为共产风刮得他们农民不能种庄稼,什么都一平二调三共产。土改刚得到的土地又收归公有,连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归了公;现在什么生产资料都“归大堆”,牲口也要归公,种啥不能由己,打的粮食也都拿走。拆掉了我们的灶,砸破了我们的锅,非要人们吃食堂不可。一会儿要人“放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一会儿食堂断了炊,叫我们怎么活?!农

民把主要罪过都归咎于共产风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三共产”搞得他们一无所有了。我看过许多农民的家,屋内空空如也,一般只有这样几样东西:一个所谓床是几根木棍或小树杆搭起来的,没床板只架上一层高粱秆;在地上挖个小坑,用三块砖头架起一个小锅为灶,旁边铺几块砖头放个瓦罐(装水用)和碗筷;农具也只剩下铁镐和铁锹。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两样农具没被收去炼钢或造飞机?他们说:“修水库总不能叫人用手挖吧?而且我们还要用来埋人哩!家里的门、缸都用作棺材了(两个缸对在一起装尸体下葬)。他们还开玩笑说我们这儿新鲜事可多了:我们已经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了’,因为无门可闭,无遗可拾。我们用缸埋人,千百年后发掘出来,还真够文物专家研究一阵子的。农民还说:缸,我们过去都用来装粮食,现在倒好,家无颗粒粮食,今后有了粮食都会被



1958年8月,河北徐水县委订出规划,要在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老鼠抢去。这里只有老鼠生命力最强。但也很反常，白天照常出来活动，说明洞里藏的粮食也空了。我在区里住的小屋（兼办公）也是这样，当时干部告诉我：它不光乱跑，有时还咬人的脚腿。得防着它，见了就打。于是帮我拣一些砖块放在办公桌头，我还真打死过两三个。为了体现“一大二公”，一度要把公社范围内的两个街镇铺面与邻居的间隔全部打通，进了一家的门，就可在里边通行全街。据说这是为了打破“自立门户”的界限。只是由于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没有完全执行就停止了。

食堂化是饿死人的最大祸根。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绝对动不得的，而且一村一食堂还嫌小，要两村三村合办，群众说，吃不饱饭还要跑几里路，来回一走，吃的那点东西都白吃了。我到旧县时，群众口粮已经完全由国家供应，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八钱粮食，搞好了可以制止饿死人问题。但放在食堂吃大锅饭，群众每人每顿能吃到一两就不错了。在外边搞工矿、修水库的民工要多吃，队里一部分人要多占。难怪群众有顺口溜说：“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脸红脖子粗，不是会计就是伙夫”。那时办食堂根本没有条件，不仅粮食不够，烧的也没有，“瓜菜代”也无法解决。我认识到解散食堂，让群众分散渡荒，死人就制止不了。有一次我到马庵大队，晚上住在那儿，食堂没煤了。第二天可能要断炊，半夜派人套牛车到平顶山拉煤，第二天中午车早该回来了，但怎么也等不到。我站在村头张望了很久才远远望见有车过来，我高兴极了，谁知到了跟前，才见车上无煤，只有一头死牛。原来牛也没吃的，快到矿上一头牛就死了。河南农用工具很落后，那时的车还是二牛抬杠，一头死了，一牛拉车，不平衡，走得慢，耽误了时间。怎么办呢？这时候，群众一顿饭，特别中午饭一点不吃就可能死人的。那天准备吃的午饭是红薯蔓（秆）拌面粉，这种饭很费火，太硬了咽不下去。红薯蔓本来是当柴烧的，现在成了这个队的主要代食品，绝不敢再烧它。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今天把食堂散了，面粉分给大家，谁要红薯蔓也给一些。这个村我比较熟悉，刚下去第一次驻队就在这个村。因此我提出解散食堂后，干群同声劝阻。干部说：“你不要党籍了？”“你不怕

坐牢？”群众说：“我们宁可饿着不吃饭，回家睡觉去，你也别冒险。”结果，也把我逼急了，我说“请会计拿纸笔来，我给你们写个字据，说明这是我坚持要干的，你们没任何责任，好不好？”这才得到解决。饭后，群众纷纷来看我，问我吃了没有，并说：“两年了我们没这样好好吃一顿饭了。”食堂解散后，一天全集镇的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他那里发现一个寡居老太太用鸡粪摊饼子吃。我马上赶去看她。见面后，才知情况更为严重，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这么多鸡粪呢（小柜还有半柜）？看来她早作了长期打算，而且说食堂化时，她吃不饱就拿它来贴补，有时感到食堂没啥吃也吃不饱，就不去食堂了。对此，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哭了，老太太哭了，赔我去的人也哭了。此事使我终生难忘。

能否吃上饭是一个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天大的事。这个问题越大，人民内部矛盾也越大，阶级斗争这个纲也才更能排上用场，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小潘复生”、“小彭德怀”则是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你反对“一平二调三共产”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你没吃的，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扒社会主义的皮，就要给“光荡”致死；你要晚上出去搞点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发现了，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不偿命。我问过农民群众，“你们这儿过去不是有逃荒习惯吗？这次这么大的灾荒为啥不逃呢？”有人说，“王书记你不知道？现在不是国民党时，那时他管不到村里，现在共产党村村有支部，党员插花到农户中，我们想跑也跑不了，况且晚上还有民兵看守呢？怎么逃得了？！”

这话简直是在骂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问这样的问题了。农民还特别说，逃荒不让逃，没饭吃还不让瘦，说面黄肌瘦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检查团来了就得把你集中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让见人。有的事后忘了开门，两三天就全饿死了。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急剧恶化起来，社员以死抗争，干部束手无策，放弃不管了。而揭了盖子以后，又把罪过全归到基层干部身上，一般都抓起来，押在县里。政权也就瘫痪了。

这时公社至少还有三人坚持办公，一是必须



留一个书记或社长,对付上级检查团,一是管计统的行家,一是管总结报告的秀才。他们可以把粮食报表计算到斤、两,假造得极其细致逼真;工作还没做,就可写出工作总结,说得天花乱坠,而且早准备好一套群众的顺口溜,生动感人。我打算首先换掉这两位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天才。恰好我们计委有位与我一起下去的王景五同志,他是我们综合局一位搞统计报表的专家,便让他顶替那位搞计统工作的天才。结果,不几天就出了麻烦,上边要报农民家果树情况,要求分村、分户还要按树种,今年各产多少,自食多少,出卖多少等等,限三天内上报,这样的报表根本无法完成,急得我们这位专家哭了起来。我问明了情况,便给县里打电话说:你们是要真情况,还是乱估些数?真的搞不了,假的你们自己去估。不过要估,我可以说点情况供参考:一是果树只有少数农家院里有一两棵小树;二是结果很少;三是都自己吃了,个别给亲戚送一点;四是没有出卖的,农贸市场全取消了,要卖也无处卖。于是这个报表才不了了之。

到了村里往往一个干部也找不到,只能找会计,因为没有会计食堂就散伙了。你要开展工作,就得恢复政社合一的政权,首先分期分批地把干部解放出来。但恢复起来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在向县里领人时,要先看材料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开条子派人去领人。回来后,要向群众见面,由干部作检讨赔礼道歉,群众点头才算完事。但两方面都诉苦,互相顶牛。干部说:我打人是上面逼的,要两三天内把群众家的锅头都刷成白色,人都不行了,回家躺在床上就像个死人,我去催一次、两次都说他马上起来就刷,第三、第四次去还没刷,自己就急了,打了人。上边和群众都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吵架、打人,我也很冤,没有什么可赔礼道歉的,我根本不想再干了。有一个中年妇女坚持光道歉还不行,他

把我的头发拔掉了一块(连带头皮),我非得拔下他一撮头发。这当然也不能同意,但工作却做不通,最后,请她的亲属来,连劝带拉,把她拉回家,才算勉强下了台。看来,他(她)们都有苦,向谁诉?只有向“大跃进”诉,我自己只能和稀泥罢了。

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这个情况过去我一直没敢写到报告中,也不敢对人说。最后,我用恩格斯的话来结尾,那就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责任编辑 吴 思)

## 书屋 2005年第12期目录

- |             |                                                        |                                 |
|-------------|--------------------------------------------------------|---------------------------------|
| <b>阡陌纵横</b> | 鲁迅的一九〇五年<br>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 伍 国<br>张晓唯                      |
| <b>尘影斑驳</b> | 让大位、按手印及其他<br>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br>拜伦与中华英雄梦            | 伍立杨<br>唐小兵<br>孙宜学               |
| <b>荷戟论剑</b> | 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br>太平军失败与李秀成剖因                              | 曹瑞涛<br>裴毅然                      |
| <b>旧文新识</b> | 第三只看日本<br>迹迹东邻 亦幻亦真<br>——读戴季陶《日本论》                     | 李兆忠<br>李建军                      |
| <b>文坛景观</b> | 一片西风作楚声<br>——近期小说一瞥                                    | 焦雨虹                             |
| <b>西书养神</b> | 飞鸿末途<br>成长之痛<br>——《美丽的曲线》译后感                           | 褚孝泉<br>石定乐                      |
| <b>前言后语</b> | 阿伦特的忠诚与爱<br>用英语思考的孔子<br>顾准著作的刊布考<br>安徒生百年印象<br>纸上漫游犹未知 | 卫撷宁<br>张云江<br>罗银胜<br>李红叶<br>李振声 |
| <b>空谷回声</b> | 还谈晚年周扬                                                 | 傅白芦                             |
| <b>女性立场</b> | “深闺有愿作新民”<br>——关于吕碧城                                   | 桑 农                             |

《书屋》2005年总目录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湖南教育出版社 邮编:410007

电 话:0731-5791300 5486759 传真:0731-5790197

# 中外人工合成胰岛素比较

● 熊卫民

诺贝尔科学奖是国人心中长久的痛。因为它不仅是一项针对个人的荣誉，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一直没有任何植根于本土的研究获得这个奖项，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国度，在高规格请进“赛先生”之后百年，仍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每到颁布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国的媒体都不免要重炒一下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冷饭，并且常常要惋惜一番——毕竟唯有它才是我国科学家在本土做出的确切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工作。但历经四十余年的宣传之后，仍然鲜为人知的是：即使在这项少有的世界级成果上，我们与国外也存在优先权之争。直至今日，美国和德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还在宣称是他们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胰岛素！

## 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

当美国的维格纳奥德于1953年合成了第一个天然多肽激素，英国的桑格于1955完成了胰岛素的全部测序工作之后，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成了一项世界性的热门课题。据国外媒体报道，1955-1965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共有10个研究小组在进行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其中，最终达到了目标的除我国外，还有美国的卡佐亚尼斯小组和联邦德国的查恩小组。

我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涉及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所、北京大学化学系等多家单位，参与人数最多时达到约800人，

少的时候也有约30人。这个题目虽然最早由科学家说出来，但考虑到它的“大跃进”背景，尤其是真正被确立为科研课题的过程，应当承认，它的提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钦点。而且，它的研究资金完全由国家无限量提供，具体工作更曾多次受多级党政领导的直接指挥。所以，从多个方面看，都可以说它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

与中国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

卡佐亚尼斯是美籍希腊人。他于1952年在雅典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随即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工作，跟195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国际多肽合成领域的领军人物维格纳奥德一道进行多肽合成研究。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譬如催产素的合成（1954年）等。1958年，他以副教授的身份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正式开始他独立的科学生涯。

他自主选择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不难理解：他在多肽合成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正在寻找新的合成目标；而胰岛素的一级结构刚刚被测定出来，正向所有的多肽合成专家提出了挑战；同时他还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并不害怕困难，敢于面对挑战。他认为，利用已有的多肽合成、分析技术，再凭借自己的独特智慧，自己确有可能登上合成胰岛素的高峰。合成途中当然很可能会遇到众多的艰难险阻，但克服它们可能意味着带来巨大的理论突破。这种前景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显然是

极具诱惑力的。而且，胰岛素给以前必死无疑的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生的福音，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如果能用化学手段合成，并通过工厂生产出来，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很具诱惑力的。基于这样的理由，卡佐亚尼斯决定攀登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峰。

查恩，联邦德国化学家，

1940年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工业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自1952年起开始担任位于亚琛工业学院的德国羊毛研究所的主任，并于1960年升为该学院教授。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羊毛。

他卷入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课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他的学生斯坦纳回忆，1958年时，他和别的一些同学厌倦了羊毛研究，特别想换换口味，凑巧听说有人在合成他们熟悉的胰岛素分子，也就想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向查恩反映后，查恩也很兴奋。不久之后，这个工作就开展了起来。

当然，上述简略区分也不能绝对化。人们的行为动机经常是很复杂的，可以有某个主要影响因素，但经常难以完全排除别的影响因素。中国相关科学家在提出课题和从事研究的时候，未必就全都违背了他们的个人兴趣。而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人的经费来自企业和国家的有关基金，这里面也必然体现有后者的意志。拿查恩来说，他之所以进入人工合成胰岛素领域，除斯坦纳说的偶然因素外，还在更大程度上出于实用目的考虑——胰岛素分子与羊毛分子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和给他提供经费的羊毛生产



1959年生化所胰岛素工作参加者

商试图通过合成胰岛素而对后者达成更充分的了解。

## 官营研究和自由研究

既然主体存在区别，相关研究的组织方式也就有所不同。

我国在这项工作上所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全国一盘棋”。多级党政领导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以集中力量做成这件“大事”。缺实验原料，马上办相关的工厂和生产车间，并组织多人到全国各地搜罗。缺实验人员，立即让数百名其他学术单位的人员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紧急过来支援。进入大饥荒时期后相关研究人员不忍心再多花经费，而聂荣臻副总理则指示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

这种组织方式在压制其他多项研究的同时，给胰岛素工作创造了相当优越的条件。就像踩高跷或者叠罗汉一样，它使得物资基础比较薄弱的中国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当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绝大部分相关研究人员都想下马这个项目的时候

候,它更是一面大做政治思想工作给他们打气,一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得这个项目延续下来,并最终导致了人工胰岛素晶体的获得。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我国的胰岛素工作之所以会遭遇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所不曾经历的极大困难,也完全是出于这种由党政官员所主导的组织方式。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出于科学上的无知,这些比较外行的官员在支配反正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瞎指挥、瞎折腾现象。在“大跃进”、“反右倾”的狂热背景下,为了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各级党政官员层层加码,发动了“大兵团作战”:把“保守”的专家晾到一边或者让其充当科研流水线中的小兵,由他们自己直接指挥多个研究单位的数百“革命”群众不分日夜地“向科学进军”。就是这个阶段出现了科研资源的极大浪费。不仅导致了大量伤病、令数百科研人员一事无成和数以百万元计的经费打了水漂,还使得合成胰岛素工作原本良好的势头遭到了遏制。

卡佐亚尼斯和查恩只是美、德两国比较普通的科学家,不曾得到国家的特别关注,也就没有遭遇上述机缘或者厄运。在锁定目标之后,他们时而独自一人,时而带领几个学生,一边书写

经费申请报告和利用私人关系寻求一点的合作,一边进行实验和思考。在研究的关键时候或者自己心情急躁的时候,也偶尔加加班;一般状况下,则不时渡渡假。根本就没人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动员他们继续做这项研究,或者采取何种方式去做这项研究。他们的经费支持者只在给钱和监督的问题上把握大的方法,根本就不关心这些细节,所有的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做主,由他们自己对科学和个人名利的追求、对胰岛素研究的兴趣所决定。就这样,尽管不曾达到很高的速度,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工作却一直都在不急不慢地向前进,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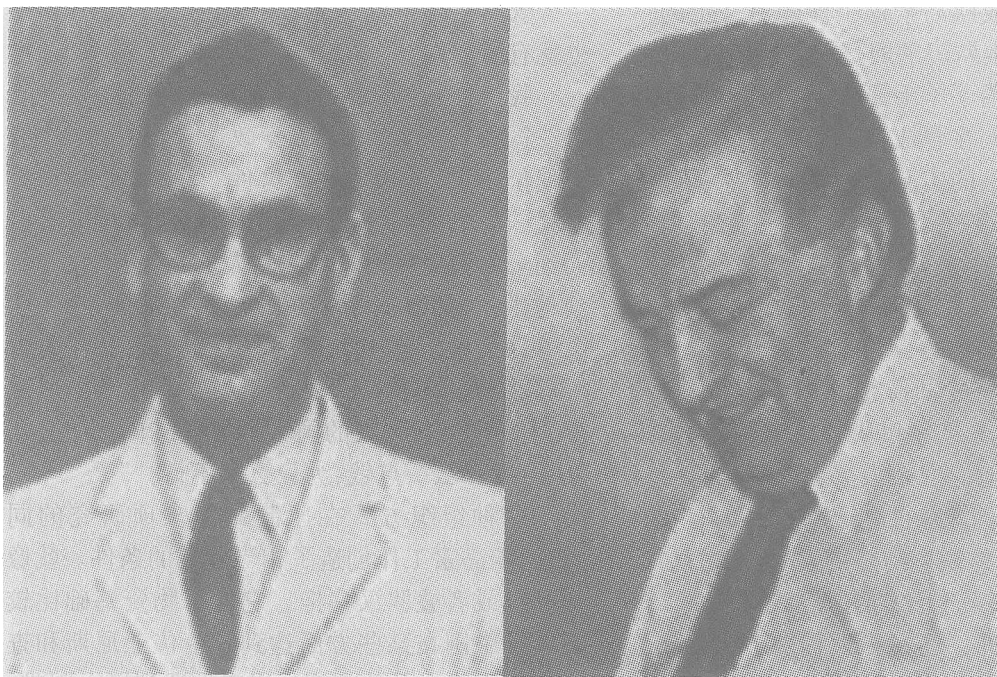
### 最终的胜利和阶段性领先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但事与愿违的是,最先宣布合成成功的居然是国外的研究者。

1963年11月底,卡佐亚尼斯在蛋白质基金会第15届科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胰岛素A、B链的合成研究”的演讲,向大家宣称,他已经合成了胰岛素的A链和B链,对它们进行初步的重组后,得到了具有微弱胰岛素生物活性的

产物。1964年初,卡佐亚尼斯又在《美国化学会杂志》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发言。

查恩小组的胰岛素工作也在这个时间有重大突破。1963年12月,他们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条短讯,宣布自己已经合成了羊胰岛素,其生物活性为0.5-1%。1964年7月3日,查恩在哥廷根举行的马普学会分



查恩 ( Helmut Zahn )

卡佐亚尼斯 ( Panayotis G. Katsoyannis )



子生物学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宣布了同样的消息。该消息被收录入1965年的《生物化学年鉴》,被认为是1964年多肽和蛋白质合成领域最重要的成就:

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胰岛素的合成;这项成就意味着蛋白质化学的大门已经敞开。有三个研究小组在进行这项研究,查恩及其领导的小组是第一个成功者。

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正如杜雨苍研究员所分析的那样:

美国人……开记者招待会,说自己已经合成了胰岛素,我们拿他发表的文章一看,他根本连大肽的合成都没有完成,他哪里来的胰岛素……关键性的文章没有发表,他前面说的话没有什么根据的……从后来的工作来看,许多关键大肽的合成他后来还是做了,而且用的是我们的方法。他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做出来了,有一定的活力,但那是以后的事。

国外科学界也并不是非常肯定他们所宣称的成果。譬如,日本坂田大学校长、曾在查恩实验室工作过的奥田畅就公开发表文章说:查恩实验室没有取得全合成胰岛素结晶,不能认为合成是完成了。

我们国家于1965年9月17日做出了人工胰岛素结晶。而且,我们还有其他非常强硬的数据。譬如元素分析、层析、电泳、旋光测定、酶解、氨基酸组成分析、指模印鉴等等。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确实是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结晶胰岛素!

但我们并不能说查恩他们完全没有一点优先权。胰岛素合成并不只有取得结晶这样一个鉴定标准。而且,有机化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还习惯于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信件的方式表明自己合成了什么,然后过较长时间之后才发表实验数据。更重要的是,合成胰岛素并不等于一篇全合成论文,它还有大量的中间工作要做——在发表最后的全合成论文之前,我们共发表了24篇中间成果。这些中间成果也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一定逊色于最后的成果,完成它们之后,最后的结果就基本上是水到渠成的了。而在中间成果发表方面,美国、德国的实

验室并不总是比我们晚。

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据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先生最近透露,1978年在决定只推荐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时,我国的有关领导人考虑到了“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性。

## 究竟谁更优胜

也就是说,我们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于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小项目上,在消耗了比人家多得多的资源、付出了比人家大得多的代价之后,仍然没有完胜卡佐亚尼斯和查恩这两位几乎是单兵作战的学者——而这已经是中国最高水平的工作了!

是不是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特别优秀呢?情况似乎并不如此。虽然他们此前此后还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一直到晚年,他们俩都不曾获得过国家科学院院士之类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他们还未必算得上是美、德两国的一流学者。而与此同时,我国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邹承鲁、王应睐、汪猷等人均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为什么把很多优秀专家加到一起,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仍然只是基本与国外的一两位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个人战成平手呢?

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体制。我们计划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官营体制下的科研产出效率实在是不够高。它固然存在集中资源攻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这种优势往往会被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劣势所超过。虽然具体在人工合成胰岛素这类可谓国家面子的少量工程性项目上,由于国家在投入时根本不惜代价,其优势还未完全被劣势所抵消,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同样多的科研资源,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其科研产出要比官办高得多。

科学上的事情究竟该由行政人员做主,还是该由科学家做主?我们国家是否还应当把资源集中于少量行政部门?鉴往是为了知今,希望人工合成胰岛素中的教训能引起人们的深醒。

(责任编辑 吴 思)

#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 余广人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文章平实的语调,令人产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回味。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向有温和之称的胡耀邦,为了摒弃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态度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一起联名,几易其稿,给中央常委写下了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这一提法的理由。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等的赞同,因而在《决议》中摒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围绕《决议》起草过程中的这一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提法是否写进《决议》的问题,而联系到当年的情况来看,这场争论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用多年后田纪云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耀邦信中阐述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因为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二是因为后来又“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

综合这两方面原因,说到底,是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在对那时国情的认识问题上,胡耀邦与一些人意见不一致,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

分歧之一是:政治报告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胡乔木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胡乔木拒绝了。胡乔木曾当着全体起草人员的面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方针性意见可以对我说,具体问题就不必过问了。”

分歧之二是: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报告起草时,经济学界薛暮桥、林子力等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等。胡耀邦认为,这些积极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见十分重要,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请文件起草小组予以重视。但是在此不久之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仍然说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现在计划经济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于是,起草小组中有人写了一封信,说那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必然会削弱计划,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信中还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胡乔木将这封信批发给中央各领导人。对于这封信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胡耀邦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审时度势,感到如今要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解决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时机还很不成熟;何况,起草小组在胡乔木的主持下,仍然用很大篇幅阐述计划经济。他只能回避这种冲突,对起草小组的报告稿作了很多修改,委婉地说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并说“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选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指导性计划”,等等,实际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了许多绿灯。

分歧之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下国情认识的分歧。这个分歧也是前两个分歧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国情是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党内习惯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

八届十中全会报告中的提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进全会公报上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段话:1、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时期;2、将整个社会主义划为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而且要长期化、绝对化(也必然会扩大化);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十年“文革”内乱的基石。

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些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八届十中全会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不分阶段地说成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是不对的;2、我国当前处于什么阶段?结论是还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可贵的探索所得出的正确观点,在1981年被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

## 中共中央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以及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全会认为，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 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部分)

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语句上来说，“尽管”二字只是一种陪衬。但是，这种陪衬却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这是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在党中央文件中的首次被确认。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胡耀邦从理论高度上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情认识的出发点。所以，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当起草组成员于光远提出，政治报告应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听了连声说“很好，应该写”。

但是，有些人抱着固有的条条框框不放，仍坚持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既然当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1、十二大报告的核心内容只要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可以了，何须提全面推进改革！2、当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何须发展市场经济！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上，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因此，当于光远的提议得到耀邦的赞同后，胡乔木不好反对，但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我们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把政治报告刚刚说过才几百字、是胡耀邦和于光远等坚持写进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完全不顾，而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报告还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报告中还提出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胡耀邦对政治报告中这些“共产主义”的奢谈并不是毫无察觉，但是他当时只认为脱离实际的空泛之话多了一些，出于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大会期间有些代表们在讨论中婉转地指出了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应当有切实措施等修改意见，又被胡乔木等人拒绝了。

这一过程，大约就是耀邦在信中所说的对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的背景。

报告中这些“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大门”的言词，今天读来不免有滑稽之感。可是当年，宣传部



门是以此为“纲”来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和要求全国的宣传、教育、思想战线来遵循的。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另一个重要成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中宣部部长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中宣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果然，1983年3月1日，就以中宣部名义发了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这份“提纲”就讲得更透彻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我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实践。”“提纲”生怕下面的干部不解其意，还特别说明：“这不仅是个名词和用语问题，而是要有科学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当前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报告更好地贯彻下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上，难以形成群众性的自觉行动，陷于混乱之中。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方说，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老革命温济泽就认为，他听见乔木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这种宣传的结果，造成大话、空话盛行，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其中尤以“清除精神污染”为最烈。其结果使得人们对政治思想教育表示厌恶，对宣传工作表示不可信甚至鄙视。

这也就是胡耀邦在信中所说的“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的由来。

## 二

既然认识到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经过推敲，且又发现在后来的宣传上引起了误解，胡耀邦当然要纠正。到了四年后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胡耀邦才得到纠正的机会。

从郝怀明文章提到的起草过程来看，胡耀邦要摒弃这样的提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仍然充满着争论——这一点，文章虽然提到但并没有展开来谈。

其实，促使胡耀邦和赵紫阳联名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决议》第三次修改稿时的争论。在这次讨论会上，好几位书记都发言肯定了这篇文稿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修改意见。一位书记作了长篇发言，详细说了他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听者都明白他的意思，前者是没有讲共产主义，后者是没有讲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但是没有什么人附和他的意见，相反有人发言说连贯性当然重要，但要把手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没有必要，还是要有新话。



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决议》修改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那位书记,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他们的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等的辞句,甚至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那位书记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而在这个根本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这时候,胡耀邦不再犹豫了。9月13日,他执笔亲自起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信,并于次日征得了赵紫阳的同意,两人联名发出。

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那位书记的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在看了胡耀邦、赵紫阳这封信后,自然批示同意。

多年以后,参与这个决议讨论修改的原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发表文章认为,起草《决议》过程中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田纪云还披露了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胡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许多人,可能有二十到三十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的了。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邓小平:不要紧。实在

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明年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决议》稿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我。你还可以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随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话,并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田纪云的这段话,应该是当年原始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坚决态度,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至少在《决议》修改稿时,邓小平对是否用“自由化”这一词有过考虑;在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时,听到陆定一等人坚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时才态度鲜明说还要继续提。从郝怀明的文章来看,在《决议》中写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耀邦的态度同坚持要去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一

样,同样坚持仍应该写上。但他要求给予正确的解释,使之不要成为打人的棍子。但耀邦这样的想法,后来却被人误传为在《决议》中不写这个词,并进而被引申出导致他被迫辞职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理由。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词已渐渐淡出的今天,回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免生出些许“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恬淡。从当年为这个词的剑拔弩张,到如今的淡出,人们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感受到了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本题。对于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站得住?在组织上是否合法?胡耀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四点理由:

“第一点,主要是因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胡耀邦还援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三段话,说“我们由这三段话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轻一点说也是很不当的。”他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言简意赅地作了阐述,也否定了胡乔木等人的左倾错误的理论堡垒。

“第二点,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决议》还指出,‘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斗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这就回答了那位书记在这个《决议》修改稿时再作的一个修改稿时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次党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过实践证明不妥当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可以的。”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十一大制定的路线,十一届五中全会改正了十一大报告把刘少奇同林彪、“四人帮”放在一起的错误等历史事实,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惑,更是对少数人质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的一个有力回答。

“第四点,从参加《决议》稿讨论的两千多人的修改意见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但是鉴于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和紫阳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报告,这样处理也是很慎重的。”

四点理由是充分的,令人信服的;也加深了人们对《决议》所确定的指导方针的理解。

令人抱憾的是,六中全会之后通过这个《决议》不过三个多月,胡耀邦就下台了。此后各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似乎也随同胡耀邦下台而销声匿迹。此后一些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远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日,愿此文化作心香一缕,敬奉在这位人民从心底里敬仰的伟人的灵前。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严如平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 费孝通在五七干校

● 刘 晓

## 初识费老

1956年8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这里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史、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像担任系主任的蒙古史专家翁独健,系副主任,社会学、民族学教授林耀华和清史专家傅乐焕。还有早就蜚声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以及王钟翰、张锡彤等老一辈学者。

费孝通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副局长,又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他曾给我们系的师生作学术讲演,讲在云南彝族、傣族、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实践,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不知疲倦,大家听得饶有兴味。记得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面对全校师生说:我马上又要下去调查了,作为当老师的不能不下去作社会调查。因为你们就好比像待哺的羔羊,我们好比母亲,下去调查就是将捕捉到的青草,变成鲜美的奶汁,再补充到你们身上。否则我们拿什么营养和有价值的东西给予你们呀!

费先生当时的讲话内容还有许多,就是这几句简短的比喻,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成了“罪状”之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的讲话是向各族师生“放毒”、“什么调查是获取奶汁,是蓄意向党进攻、毒害青年的毒汁毒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明明知道这种批判是歪曲原意,无中生有,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费孝通是钦定的右派,谁能扭转这种局势,谁能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在学校范围进行了一个月,1957年的暑假前,方告一段落。暑假后,学校

的政治空气依然肃穆紧张,而学习空气却一天天淡薄。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师,像系里的吴文藻、费孝通、王钟翰等人,从讲台上消失,学生们都不敢去接近他们。此后的几年里,他们和学校研究所的一些人被编在一起成立小组,默默无闻地去整理史料,翻译边界问题的资料。尽管后来得到了所谓“摘帽”改正,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依然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也仍然无法像正常老师那样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接触学生,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

## 发往干校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作为培养教育人才的高等院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中央民族学院也不例外,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混乱中,潘光旦先生和傅乐焕先生遭到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先后离世。此后全校师生分成两派,打起内战来。一些关在“牛棚”的“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因为两派内战不休,无暇顾及对他们的管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军工宣队开进学校,实现两派大联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又成了审察的对象,政治空气突然又紧张起来。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战备疏散第一号命令,北京的机关、学校大部分人员要疏散到外地,开往五七干校去接受锻炼和劳动改造。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设在湖北省潜江县的广华寺,简称沙洋干校。动员令下达后,学校第一批发往干校的人,首先考虑的就是打入另册的五类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等等)。费先生当然名列其中,那年,他已是快满60岁的人了,



同样要和学校的广大教职员工一起,收拾行囊,告别妻小,登上去往湖北沙洋干校的火车。

设在潜江沙洋的所谓“五七”干校,其实是湖北潜江县的一个劳改农场,在我们全校教职员工到达时,留场就业的劳改犯人还没有全搬走。这里既无像样的房舍,也不见其它设施,只有几排原劳改犯住的简陋房舍和管理劳改犯的办公用房,外加羊信房和几间烤烟房,还有稍远的农具和拖拉机仓库,总共不足百间房子,能住人的充其量才有六七十间,当时我们开往干校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是携家带口全家搬走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如何安置?大家守着像山一样大的行李堆,静静等着军宣队的安排发落。成年人和老年人还可以忍饥耐渴,小孩子们等不及,一个个哭闹起来,喊着要东西吃,要水喝。费先生当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一旁,看着教职工们焦急和无奈的表情,心里也急,他默默地找到自己的行李包,从里边掏出从武汉带来的吃食,分给周围饥渴的孩子们。

接近傍晚的时候,大队人马才算分批有了安置。可是由于房子少,男女必须分开,每间房子内都用刚刚砍下来的树干搭起的双人铺,上下各住8人,睡下去只能侧身,翻身都很费劲,全家搬下去的职工,也只有老年夫妇才能得到一点照顾,可以住在一起。

除了住房的拥挤,喝水也成了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打井,搭建食堂。我们历史系的职工,也和其他系职工同样按军队的编制组成,我们历史系是一个排,排下边是班,我和费先生同分在一个班里。由于班里老年人居多,被分配参加打井的辅助性劳动。打井这种活,谁也没有干过,气力不够,又不会巧干,挖不到两米深,出了水,个个脸上身上溅满了泥浆,活干的很辛苦,但是彼此看看满身的泥浆、花脸,都互相开着玩笑,用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不悦。不久,挖井工程完成,开始供水,解决了几百人的喝水问题。沙洋的水质不太好,但是水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所以喝起来

还觉得甜滋滋,另有一番滋味。

挖井工程过后,我们班又转去搞基建盖房子。壮实年轻一点的教师调去拉沙子和泥,年老的、女同志当小工,将拉到工地附近的砖,一块一块的传到砌墙师傅的手中。一天干下来,对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先生们来说绝不轻松,即使年轻一点的教师,也累得腰痛手疼,不愿动弹。这种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班,除了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人外,后来又从北京和湖北咸宁两地将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也调来编在我们班里,参加盖房子的劳动。大家在学校没有很多机会能“四世同堂”(指从吴文藻先生传承到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再传到我们,共四代师生关系),可是沙洋干校的特殊环境,却把几代师生聚拢到一起,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大家互相照顾、互相鼓励体贴,成了一个大家庭。患难出真情。劳动中,班里的老弱妇孺组织起来,年轻的帮助年老的,大家协手照顾说笑不断,感情更加融洽,劳动效率也渐渐高起来。

费孝通、林耀华虽已年近花甲,可是在老师吴文藻、师母谢冰心面前,仍是小学生。传砖时,费先生不忘关心照顾他的老师,主动站在吴先生的前边,每递一块砖,就多走两步,凑到老师身边,将砖送到吴先生手里,用此办法减少老师的劳累。他还时常到谢老太(在干校时大家都这样称呼谢冰心



作者在费老家里谈心

先生)那里问寒询暖,送去吃的,生怕师母有个闪失。这种无言的尊师风范,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别人看来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或许缺少人之常情,但是干校的相处,让我看到了他们身处逆境,彼此间的师生情谊非比寻常,即使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都自然地显露出那种待人诚恳大度和为别人着想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沙洋干校的劳动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干校领导就通知我们四连和二连共出8个人,一起到干校附近的红桥大队红桥生产队插队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锻炼,军宣队指定我们班出3个人,两女一男,我和费先生榜上有名,同分在一个生产小组。在农村的40天,和费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彼此照顾,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更进了一步。

红桥生产队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贫瘠的农村,下属的第三生产小组,总共不到10户人家。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农民生活很苦。住房是篱笆墙搭成的草房,四围见天,村子里没有井,到处有水塘,吃水吃村边池塘的水,人畜共饮,水的混浊情况,可想而知。下雨天被子衣服全是潮湿的。我和队长商量,把费先生安置在贫农张万洲家,我住在林业队长家,中间相隔两户,其他6人安置在离我们较远的生产队队部周围。张万洲家共四口人,都有劳动能力,家境稍稍优越些,比我的住户(劳力少、孩子多)强很多。我们每天都要和生产队的老乡一起拿上农具下田劳动。费先生起的早,每天上工前都是到我的住户门前叫上我,然后一起出工。插队期间,正逢江汉平原上摘棉花的季节。一望无际的棉花地,白花花的棉桃挂满枝头,让人看了感到心旷神怡,十分振奋。我和费先生都出生在江苏,从未见过这么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惊异之后,见到大朵的棉花便手忙脚乱地抓摘起来,一天下来,看看篓里的棉花并没有摘多少,而我们两个的手指都被棉壳、枝杈扎出血来。老乡们知道后,都围过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急,教我们如何摘的方法。费先生对我说:“摘棉花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不学习的话,我们是要吃苦头的呀!”收工时,老乡们个个背篓里满满的

棉花,可我们仅摘了一二十斤。经过几天的磨炼,我们的两手变得灵巧了,精神也放松了许多,摘的速度加快了。有一天费先生竟摘了40斤棉花。40斤重的棉花背篓,对长年劳动者背起来不算什么。然而对费先生来说,却是不轻的负担,社员们看到他很费劲,抢着帮他,他不干。我想他是怕在老乡面前丢面子,不肯接受帮助,当离开人群过沟坎时,我想去接过他的棉花篓,他也不肯,偷偷地说:“非要自力更生闯过这一关。”说话间,他背着棉篓下田沟,陷到泥浆中,我焦急地放下自己肩上的几十斤棉篓去拉他,他却笑嘻嘻指着两只不停顿挣扎的泥脚说:“刘晓你看,真个越陷越深,拔不出来了,但我一定要拔出来!”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所说,我先是心中一酸,很快转念接过他背上的背篓,使劲地拉他。当他走出泥沟,又笑着打趣地说:“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关!”

农村的生活,老乡们朴素热情对我们的照顾,很快使我和费先生由拘束变得活动自如了,慢慢地我们主动走进老乡当中,和他们谈家常,谈生产,说国家大事。彼此感情亲近起来,有的老乡告诉我说:你们刚来时,大家都传着说这一批新来的劳改犯比过去的有钱,你看他们“穿的破,吃的好,光着膀子戴手表”。可生产队给我们介绍说:“你们不是劳改犯,是北京下放来的。”有的干脆就直问:“你们都是干部,在北京当大官的吧?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帮助我们干活?”有的妇女还凑到我的耳边问我:“这老人(指费)是你的长辈吧!是不是亲戚?”我和费先生解释说:我们都是学校教书的,不是当官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下来要向你们学习。说的他们都摇头不认可。说我们没讲实话,但都认为我们都是好人,老实人,将来会官复原职回到北京。

大家感情上的贴近,很快成了朋友。尽管生活很苦,但老乡们想方设法为我们改善伙食。张万洲老人看到费先生年岁大,找我商量说:“老费年岁大了,不能委屈他。再说你们来这里住也是短期的。他住的房子阴暗潮湿,还是换间向阳的房间吧!就搬到我儿子的新房住吧!”费先生知道后,执意不肯用主人家的新房,说:“不能给老乡添麻烦。”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可是没有几天,天气骤变,费先生没有注意添加衣服,受了风寒,发起高烧来了。晚上梦语不停,我得知后,十分担心,怕

他转成肺炎,守护他一夜没敢离开他的床边,按时为他灌汤吃药,不断地换凉毛巾退烧。张万洲一家也忙个不停,早晨蒙蒙亮就送来开水和稀饭,还派他的儿子到供销社买了个新暖壶供费先生使用,并全家一齐动手,把床铺和费先生一起不容分说地搬到了向阳的新房间。待他烧退了,清醒以后,看到我守在他的床边,便抓住我的手,和张万洲玩笑地说:“你不是说她像我的女儿吗?看来这次是真的做了我一夜的女儿,守护了我一夜,我都不知道。”

费先生这次发高烧病愈后,身体有些虚弱,他仍坚持每天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休息不够,不久他的哮喘病犯了,一天无论向嘴里喷多少次药也不管用,憋的他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在大田劳动时终于倒在了田里。我遇到这种情况万分着急,找来了同来的医生小罗商量,马上决定送他回干校,费先生坚持不肯回去,好歹劝说送走了,可是在干校没有休息几天,他又回生产队来了。张万洲觉得老人愿意回农村里和大家在一起,便和队长商量,不派他到田里劳动,叫他白天和生产队饲养员一起放水牛,晚上给张万洲上高中的儿子辅导功课,这两件差事,费先生都干的很得心应手,与张万洲全家和左邻右舍的农户接触更多了,他无顾虑地和他们谈古论今,细心观察村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在西方学到的调查研究方法,开始了他的老本行——社会调查。我看到他几乎每天都和张万洲坐在村外宽阔的草地上,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谈生产队生产和农户的收入情况,他还向生产队献策,问张万洲一个人能不能多放几头牛,牛多了肥就多,肥多了又可以增产丰收,既可增加社员收入,又能为国家作贡献。他建议生产队多养母牛,这样可以本钱少,增产多,1+1=2,2+2=4(当然母牛若能一年产两仔更好),牛生牛、牛产肥、肥增粮,粮多了牲口的饲料解决了,再生产,再增产,人民生活也就渐渐提高了,孩子也有钱上学了。知识变产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人们的日子不是越来越好,生产队也越来越富裕,再办各种事业,不是更好了么?一席话说的很多听者入了神,乐滋滋的,张万洲见人就说“老费有学问,他什么都能扯到我们庄稼增产上来”,“他说的都是我们希望的事。”从此,他和社员建立起友谊,后来我们离开生产队回到干校仍

不断来往,不时骑车去红桥生产队探访,有时还给住户送些当时市面上不好买到的东西,像煤油、火柴、烟、糖果、肥皂等等。老乡们也不时拿着土特产或自制食品(如冻米糕、大馒头)到干校来看望他。直到他从干校回到北京,仍然和他书信往来不绝。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驰名中外的学者,竟然一点架子没有,如此的平易近人。不管自己处境如何,心中总是装着老百姓,急人民之所想,国家之所需。后来他一再跟我说:“农民是识货的,他们虽然质朴无华,其实他们最懂得分量”。还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喜欢水、喜欢住在水边,因为住在水边的农民,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所以我愿意和他们交往。”

1993年5月费孝通先生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红桥生产队,去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农民朋友,遗憾的是他的住户张万洲和他的老伴、儿子这时已先后离世,再也无法叙旧。

## 学种棉花

插队回来的第二年,1970年4月,我们班的劳动由专建房子,转变去兼种棉花。军宣队领导给我们连下达的指标是种100亩棉花。可实际上任务都落在我们班10多个常务劳动力身上,其中包括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林耀华和夫人饶毓苏、翁独健夫人邝平章,还有几个近60岁的老教师,这个队伍真是老弱残兵,不成样子。虽说担子重、劳动量大,可大家都想尽其所能完成定量。劳动一天下来,人人精疲力尽,连走路都抬不起腿来,但看到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棉苗,一天天茁壮长大时,内心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快活。可是天气变暖,棉田有了地虫,同时间苗、定苗、除草、松土,道道工序也一起提到日程上来,大强度的劳动让“老兵们”再也无法应付了。因为这些活计都需要腰上的功夫,而大家都是常年握笔杆、坐办公室的,哪里练过这般功夫,开始还可以勉强支撑,后来年纪大的干脆坐在地上往前推着进。费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取笑说:我们在这,不只学会了捉地虫,间棉花苗,还学会了“推压机”(指坐在地上往前推着走,时间长了站不起来,还要靠别人帮助拉起来)。这时,抬头四望,你会发现大田里整齐的劳动“大军”,大多改成坐着推进,直立弯腰操



2001年春节期间作者夫妇拜访费老

作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为了消灭害虫，我们不管老弱都要背着净重四十斤的药桶齐上阵，每天来往穿梭在棉田里，给棉棵打药。费先生这样的老人，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其情景正像他在干校家书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天天泡在（棉）田里面，还抓不开，因为草多、杈多、虫子多，在温度40度的酷暑烈日下，周身汗洗，想来是健身良方。“短衫汗透迎浆水”更觉切情了。露在衣衫外的皮肤已黑黝黝的如非洲人士，很多人光了上身劳动，我还穿了件汗衫，因为紫外光太强，皮肤下层有反应，出一粒粒小泡，很痒。（见《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第141页）

到收棉花的季节，棉棵长的都齐人高，这时虽早已过立秋，但骄阳仍然似火，大家钻在密密不透风的棉秆中间摘棉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谢冰心老人走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咏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费先生接着谢老太的话也附和着说：“收粮食辛苦，收棉花也真不易呀。”老人们的话唤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大家在

“五七”干校，通过亲身参加劳动刻骨铭心的体验！

## 坦诚的师生关系

从1969年底到1973年初，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广大教职工不仅负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军宣队执行极“左”路线，大抓阶级斗争，在干校不仅继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还要对现行的所谓“516”反革命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大搞逼供信。

我从红桥生产队插队锻炼回到干校不久，即被列为审查对象。因为我在学校时，同大家一样也参加过一派群众组织。这一派群众组织是军宣队抓“516分子”的重点。干校成立了若干个审查小组，不少“516”审查对象，受到隔离监禁，失去人身自由，运动还处在深挖阶段。我被牵连进去，说和

“516”有关系。“罪状”是“整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要我老实交待这方面的问题。军宣队想从我身上搞到材料，顺藤摸瓜，挖出背后更阴险的敌人。今天对年轻人讲这些，或许认为荒诞可笑，可在那时，却有多少人相信这种“鬼话”。军宣队队员和搞专案的“左”派们，轮番找我谈话，施加压力，如果我说没有问题，便打态度，说对组织不老实、抗拒运动，快滑到敌人的边缘了，还不回头！威逼恐吓接踵而来。既被审查，自然要遭受孤立，组织上视你为异端，不再信任，熟悉你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近，专案组的人板着脸孔追逼，责令我交待问题。这突如其来的审查，使我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自己既惊慌失措，又苦闷委屈，无处诉说，无人信赖，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再加上由于不交待问题，说我态度不好，剥夺了我和亲人的通信自由，使我再也得不到家人及孩子们的消息。我着急绝望了，想在绝望中以死来抗争，用结束生命以求解脱痛苦。不想我的行为招来了更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再理我，很长时间我是在孤独和不服的煎熬中过日子。这时只有费先生和几个所谓有问题的人敢来接近我。费先生在对我的批判会上，没有发言。看我整日闷闷不乐，给我送来一碗热汤，



四下无人时就开导我说：“要往远处想，眼前的处境是暂时的，你是世家子弟出身，一帆风顺，没有经受过这些，可以理解，不能总这样，要从困境中走出去。”又说“是会碰破点皮的，皮破了再长好，就不在乎了，要振作起来。”老师的话，虽说的很朴实，但对孤立无助的我却给了莫大的鼓励和安慰。随后，费先生还经常有意地叫着我一块去挖荠菜做汤，一齐打饭吃饭，使我打消了消极的念头，慢慢变得冷静下来。有时我跑到谢冰心老人那里，听她讲诙谐有趣的文学故事，看吴文藻老师如何每天坚持看报、剪报、作卡片、编号；有时和更多的人一起听费先生讲读报心得，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记得有一次在河岸的树荫下，特别听了他讲到刚刚开始乒乓外交，中美政府巧妙的接触。他敏锐地感到了国际形势即将发生大的变化。他预见说：小小乒乓球将推动大的地球更快转动，从而牵动世界局势的变化，引发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世界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对国内产生影响，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使用问题快有变化和盼头了。他的讲话里，充满乐观、信心和希望。在场的听众都听得十分专心，折服他的精确分析和推断。在封闭的干校田野里，当时有这样一股春风掠过，让大家视野顿开、一扫心中的郁闷，心情真是舒畅多了。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干校的政治气氛有了很大的转机。生活居住条件也早有了改善，我的住房经过调整和费先生的住处仅隔一个房间，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费先生为了帮我排解精神上的苦闷，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不到5点就约我一起沿着干校后的河岸散步，或者去江汉“五七油田”发信、买东西。遇上大休息天，我们洗完衣服就一起骑自行车去离干校8里外的一新街吃“龙抄手”（馄饨）和肉丝面，打打牙祭。开始时仅我们俩人不声不响地去回，后来有人知道了，硬要跟着我们去，揩费老师的油，叫他请客，他也总是乐呵呵地不加拒绝，自愿出钱和大家一起解馋。这样和费先生谈话聊天的机会多了，不免常常在他面前发发牢骚，倾吐内心的苦水，认为自己在这里横遭审查，感到无辜和委屈，前途未卜。费先生总是耐心地宽慰我说：“你只要想一想，你现在身后没有保镖（指受审查的人后边总有人跟着监视其行动），不是比别人自由多了吗？不要总想着委

屈，烦恼，不愉快，要胸襟宽一些，眼光放远一点嘛！”还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说：不要再想轻生的事，你想想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帝国主义欺负了，这是谁人，哪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我这个臭名远扬的人还要活着呢，你那么年轻，要珍惜呀！不搞清问题，糊里糊涂地离开人世，不是自己吃亏吗？

费先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乐观豁达的战士，是一个心胸宽广推己助人的长者。他是我的好老师。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亲切温暖，浑身有劲。他叫你心情放松，什么话都可以倾吐。我知道，由于当时我们各自的身份不同，有些话是不能说透的，但是老师的真诚期许，无以言透的隐语，我是心知肚明，获益良多。

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等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1972年春天，国内外形势有了松动转变，一批接着一批的干校战友开始打道回府回北京去上课了。费先生在他的老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离开沙洋后不久，也应召打点行装准备返程。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就要离开这里了，这两年来对这里生活确有点留恋。说要走，留恋之情也就成了形。在旷野里劳动时，呼吸万里，感到人生很真实。密集的团体生活对人的表现也容易体悉，深刻得多，较之旧生活似乎更有意义。……这个机会是难得的，说要走，不免有些怅然若失。”临别的那天，他把用了两年多的小饭盆递给我，“这饭盆留给你（这饭盆至今我还保存着），以后吃饭，可以用你的饭盆盛饭菜，这个盛汤，一菜一饭一汤，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吧，我们北京见！”

1973年沙洋干校宣布解散，我回到了北京，又恢复了往日大院里的生活。清晨，费先生仍然起得很早，围着家属院的马路跑步，锻炼身体，有时站在我住的楼房窗前喊我，让我下来和他一起跑步——实际他是端着两只胳膊漫步行走。一路说着话，仍然是笑吟吟的，和在沙洋干校没什么两样。有的同事看到了，不解地问：“费老先生怎么对你那么熟识亲切？”我说：“因为他是我患难时的好老师，干校时期‘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呀！”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 熊希龄退出官场之后

● 龙儒文

熊希龄(字秉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曾经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担任了三个月的财政总长,八个月的热河都统,六个月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

退出官场后,熊希龄首先是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1916年3月第一次主持办理湘西灾赈开始,他的后半生从此便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主持了胜直救灾、北五省救灾、义赈湖南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其中尤以胜直救灾最为有名。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普降暴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使北至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胜直一带,全部受灾。京兆及直隶一省,有105个县、1.9万余村、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达600多万人。仅宝坻一县,灾民就达30多万。

洪灾暴发时,熊希龄在天津,目睹了灾民惨状,1917年9月25日,他赶赴北京劝告政府,力主赈济整个灾区。

北京政府当即召开国务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财政总长梁启超将讨论结果电话告知熊希龄,他不回话就无法定义。

熊希龄原本只想出面向政府提出筹赈的建议,根本就没想到政府竟然执意要他出来主赈。自从1916年6月隐居天津后,他就决定退出官场,要他重新回到政府来任职,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他是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看到数百万

灾黎扶老携幼,栖息旷野,风餐露宿,惨不忍睹,不得不勉为其难。9月29日,冯国璋颁发大总统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次日又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给熊希龄赶办急赈。10月4日,熊希龄正式就职任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设立了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设立了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

他将救灾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为:一是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二是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绝官吏之侵蚀;三是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共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四是堵筑决口,以防水患之蔓延。

救灾工作分为赈务与河工两个方面。赈务方面又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主要是赈济灾民。所有各赈,都得先有巨款才能进行。然而北洋政府财政支绌,仅给熊希龄拨赈款30万元,这无疑是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因此,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捐助现洋500元,然后又将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家人督率婢仆缝纫,得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群起响应,捐衣捐款者源源不断。总计捐数,共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得煤3400吨。政府拨款的不足,居然由此得到了巨大的弥补。

筹得这些款、物后,熊希龄立即着手赶办急赈。他一面派人前往锦州、营口、奉天、四平街、铁岭、开原、公主岭、长春等地采办赈粮,开办粥厂,救济民食;一面通告京畿各县,严禁出卖幼孩和宰卖牛马;一面派人前往安平、定县、安国、沧县、盐山、内邱六县放赈;一面致电各省,要求转运赈

粮、赈煤、赈衣及赈务电报免费、免税。在他的统筹规划下,京畿特大水灾的赈济工作很快便收到了实效,冬赈、春赈、杂赈、以工代赈等也办得有条不紊,600万灾民因而得以全活。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熊希龄还着手对河工进行治理,以彻底根治水患。他从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组织民力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河流进行治理,将各淤塞之引河、减河分别疏浚。随后他又组织成立了胜直水利委员会和运河工程总局,对天津海河进行治理。特别是他所著的《胜直河道改善建议案》,更是成了北方河防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是熊希龄真正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开始。他的这次救灾活动,在工、赈两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使熊希龄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相传熊希龄中举后,曾画了一株枝叶俊秀的棉花,很多人开始见了都不以为然,待看了他题的“此君一出天下暖”这几个字后,个个惊得瞠目结舌。从1917年后,熊希龄毕后半生之力践行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这一誓言。

## 二

熊希龄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是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将全国各地的数千孤贫儿童收留起来,用当时最先进、最优良的方式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奉命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不久,熊希龄就看到、听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乏食,或把儿女遗弃路旁,或像牲畜一样出卖,或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集体自杀。可怜这些孩子,他们生下来并没有什么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出于一种极度的同情心,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聘请天主教徒英敛之担任局长,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任会长)从民捐存款项下提拨经费,专门收养这些灾童。

当时熊希龄设想,慈幼局只需办理5个月,待水灾平了以后,即可将这些灾童分别招领或遣送。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水灾平了以后,竟然有

200多灾童没有人认领。这样一来,熊希龄不得不想办法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来收养教育这些儿童。他请现任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请将香山静宜园拨与督办处,用来建造一所规模宏大的慈幼院,索性把京城内外贫苦旗民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得这些孩子受苦。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香山慈幼院基本建成。初建时的香山慈幼院分为男女两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总院六个分院。总院为全院的行政中枢,第一院为蒙养部,第二院为小学部,第三院为中学部,第四院为职业部,第五院为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其设施之完善和规模之宏大,足以作其他各私立学校和慈善教育机关的模范。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640名孤贫儿童。到1926年,在院儿童已达1704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把近7000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了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等都是他的学生。



熊希龄

然而,当时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往往把它与教会或外国人办的孤儿院与育婴堂等同起来,担心把孩子送进去会被挖眼睛或挖心脏,因而对孩子入院都顾虑重重,不少人都是抱着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碰碰运气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送进来的。孩子入院后他们才知道,慈幼院竟是这样一所环境优美、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学校,这里简直就是贫困儿童的天堂!

香山慈幼院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更是当时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它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即正生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它“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慈善教育的先河。尤其是他创建的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15年!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称颂之声,遍于环宇。

它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1929年7月,美国记者团边参观该院蒙养园边忍不住称赞该院。“较之美国所办之幼稚学校有过无不及”,“足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多少年后,曾在该院任过教的陈树人老师,回忆起该院昔日的盛况,仍感慨万千地说:“只就经费一端言之,已远超过张伯苓先生之于南开,胡元倬先生之于明德。全赖秉老爱心独运,发为民胞物与,救死恤伤之心,致其毕生教育及慈幼事业之辉煌成就,足以垂范后世!”

### 三

熊希龄同情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援助了身陷绝境的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在白色恐怖下,保护了李大钊的家属。

1921年9月,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刘明严

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购买军火和强行住进中法大学,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留下来的女生熊季光、蔡畅、李志新、萧淑良等因找不到工作,完全断了生活来源,忍饥挨饿,度日如年,不得不写信给已回到上海的向警予陈述困境,请求紧急援助。

向警予此时分娩在即,病魔缠身,接到姐妹们的求助信后,寝食不安,一筹不展。谁能怜悯和援助这些蹇留海外的学子呢?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援助这些海外孤儿,那就是湖南同乡熊希龄先生。当时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人就是通过熊希龄筹款和支持才得以成行的。此时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正担任中法协会执事的熊希龄先生了。于是,她不顾自己身怀有孕,毅然挺着个大肚子,冒昧求见熊希龄,向他一一陈述了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情形。

熊希龄听完向警予的陈述后,欣然慨诺出面臂助,并一再嘱咐她进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援助工作全由他出面主持。

向警予因临产在即,进京不便,没有及时赶到北京。熊希龄返京后,见她没有如约前来,以为她是经济困难,立即托蒋华卿带去一信催促,同时还附路费25元。

当他得知向警予因恐火车颠簸而不能来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华法学务协会,并亲自出面向政府请款,政府当即拨款10万元,用来紧急援助和救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渡过了难关。

后来,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大部分转入中法大学学习,生活困难的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80多人,并疯狂搜捕与李大钊有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在李大钊家属生死攸关的时刻,熊希龄机智地以女儿结婚迎宾为名(他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于1927年4月3日完婚),派当时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李凌斗(即李时),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和封锁,用自己的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

熊希龄觉得还不安全。为了防止不测,他没



有立即把赵纫兰母子接进香山慈幼院,而是秘密地把她们母子藏进了香山红山头南麓正黄旗对面的“姑娘场”。逃过奉系军阀的大搜捕后,他又及时协助共产党人将她们母子安全转移出京。

李大钊被害后,停灵6年不能安葬。1933年春,在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名流学者

的奔走呼吁下,始得以出殡安葬。出殡那天,熊希龄又组织慈幼院的部分进步师生赶来为他送葬。

不久,赵纫兰也去世了。李光华和李欣华兄弟求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二话没说,立即再次伸出援助之手。1934年秋,李欣华兄弟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学习全部免费的待遇,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50多年后,李光华深情地回忆说:“对我来说,香山慈幼院的那段生活不仅仅是一般的过去。如果把回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山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的一支最优美动人的歌曲。”

当时,熊希龄在慈幼院还收养了不少朝鲜共产党烈士的遗孤和中国死难烈士的后代。现在不少健在的慈幼院学生,每每忆及熊希龄的这种宽宏与达观之举,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灾民的临时住处

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军的大举入侵不仅不及时组织反抗,反而想乘机围剿红军和剪除异己,熊希龄立即联络马相伯、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章士钊等60多人,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提出三项救国主张,要求国人团结抗日、共御外侮,使得抗日救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他们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拼死抗争,“本会誓为后盾”。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亲临宋哲元将军的第29军,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第29军官兵率先通电全国,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震撼人心的呼声!

“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熊希龄立即组织成立了“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积极筹集社会资力抚育殉难将士遗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接着,他又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对自己一家的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具体的安排,还组织院内200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开赴战区医院帮同看护伤兵和难民。随后,他又在香山北辛村为自己修了一个生圻,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14元,以及41张房地契、1张矿产股票和1张地契银行存证等多项未计价或无法计价财产,悉数捐充

#### 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立即感到国难临头,若不奋起抵抗,则国难家破之日将为期不远。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比较强的冯玉祥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

儿童幸福基金,以孑然之身,全力奔赴国难。

长城抗战开始后,熊希龄立即以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卍字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喜峰口、古北口、石匣等地救死护伤。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护伤之事”。他在北平设立了一所后方临时医院,在平、津、察设立十余处难民收容所,一面救治伤兵,一面收容难民,历时三月之久,筹款40多万元,收容难民5万多人。在前线各地,人们经常看到这位63岁的老人,臂缠红卍字袖章,日夜出没于负伤军民和难民之中,给前线将士以莫大的鼓舞。

在长城抗战这一重大救济活动中,熊希龄自始至终亲自指挥,或坐镇北平,或亲临前线,为抗日救亡立下了汗马功劳。

淞沪会战时,熊希龄与夫人毛彦文正住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住处离战场不到千米,随时都有被日军轰炸和被流弹击中的可能,亲友们都劝他们离沪远避,他却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卍字会会员,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之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从事救护工作三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所,救出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15万多人。此外,他还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

在淞沪会战的第八天,熊希龄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在信中,他将一个星期以来上海的战况和自己在沪组织救护伤兵和收容难民的情况,告诉了女儿女婿。仅一个星期,他就和上海红卍字会的会员们一起,从火线上救出伤兵400多人,收容难民6万多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这封家书字字珠玑,声声震耳:“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故决计与妈妈在此办救济也。”“儿等青年当为国尽忠,以慰老怀!”

在淞沪会战初期,熊希龄看到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毫无畏惧,对战局还十分乐观。白天他奔走于伤兵医院与难民收容所之间,晚间稍有余暇即写文章向当局贡献抗日救亡意见,日以继夜,不肯休息。

当时,他几乎天天盼着前方传来捷报,因此总保持着一种振奋乐观的精神状态。直到大场失守,他才开始意识到上海可能再也不能久呆了,但仍始终期待着能出现奇迹,期待着战局能扭转。闻讯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后,他当场痛哭失声,悲痛欲绝。这时,他才决定立即离沪返湘,准备一边在长沙主持筹建香山慈幼院长沙分院,一边继续募集抗日救亡经费。

那时,长江航运已断,上海成了血肉磨房。熊希龄与毛彦文不得不绕道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坐火车返回长沙。谁知刚到香港不久,他就因战事失利刺激太深,精神负担过重,不幸猝发脑溢血,于1937年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享年仅69岁。逝世的前夜,他还向四处写信为抗日救亡筹款。

熊希龄抛下他未竟的事业和1000多名嗷嗷待哺的孤贫儿童走了。他逝世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说:“赈务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才猷卓越,学识湛深,辛亥光复以后,屡任要职,望实允孚。嗣后办理慈善事业,提倡民众教育,原力恢宏,功在社会。此次抗战开始,在沪创设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护所,悉心赈济,成效昭然。近以中愤填膺,瘁疾逝世,追怀往绩,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由行政院转饬湖南省政府举行公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资表彰,而昭激劝。”

论世知人。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教育落后的旧中国,熊希龄“能以慈功垂社会,常留余德到儿孙”,“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前的作为是了不起的。香山慈幼院的学生们对他们敬爱的熊院长,始终感恩戴德,铭记在心。

1992年5月17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上海交大首任校长唐文治

● 周金品

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字蔚芝，别署蔚经堂主。早年主持上海南洋大学（后改名为交通大学），交大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文治堂”。晚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桃李遍及国内外。

清朝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唐文治出生于江苏太仓。他自幼勤奋好学，27岁中进士，深得主考老师翁同龢的赏识，历任清政府户部江西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云南正主稿行走，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但他不入俗流，力主改革，后来便成了一位思想开明的爱国学者。

唐文治29岁那年，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满腔义愤上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发愤图强、励志改革的8条主张，甚为翁同龢所激赏。他向清朝当局进言道：“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张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针对清廷行政用人的腐败，他明确提出“正人心，别流品”，“务刚断，严赏罚”，“正官常，破资格”等；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改革武科试弓矢刀石之旧制，通晓新的军事学和新式武器；以及“联邦交，简使臣”；“塞漏卮，节浮费”等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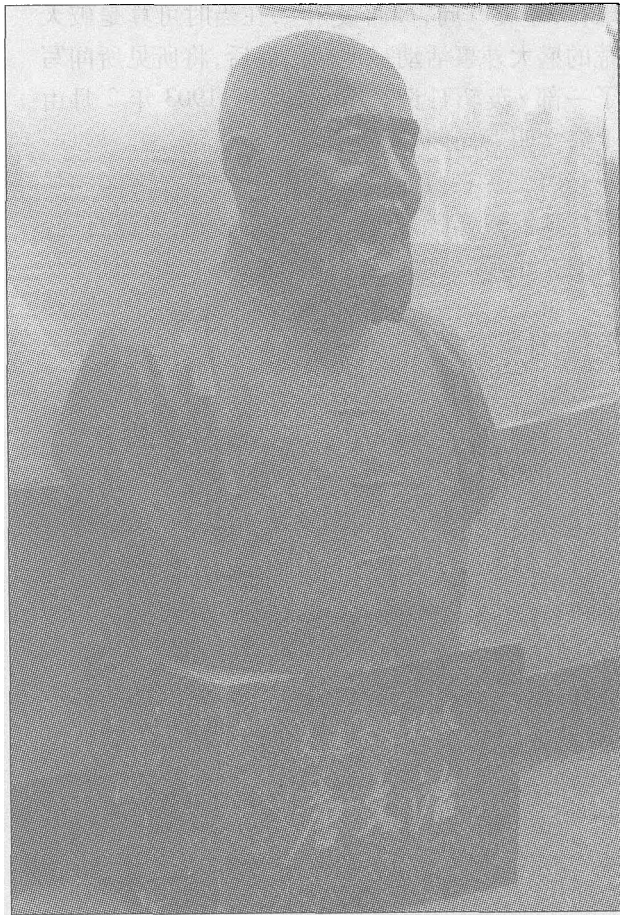
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锡、太仓应试举人向朝廷集体上书，所奏《上察院呈》折就是唐文治起草的，奏折极力反对卖国的和约。以上两项奏折，均比历史上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还早，却鲜为后人所知。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得到了清廷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同年二三月间，唐文治也先后呈奏《谨殫血诚以

维国脉》折和代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衷舆论”，并极力反对贪污和专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翁同龢也被革职回乡之时，唐文治不怕受牵连亲自到正阳门车站为翁送行，“黯然而别”。

他后来在外务部供职时，曾坚持拒绝葡萄牙向我提出增加租借地的要求，因而挫败了葡国的图谋。1902年5月，英王将加冕于伦敦，唐文治



唐文治先生塑像



唐文治先生的爱孙、原子科学家唐孝威院士偕其女儿瞻仰“唐文治先生纪念馆”

奉命随使英国庆贺，并应邀访问比、法、美、日诸国，“经途八万里，为时十七旬。滂滂地圆，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在当时可算是破天荒的盛大外事活动。他回国以后，将所见所闻写了一部《英轺日记》共 12 卷，于 1903 年 2 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使国人大开眼界。

唐文治在日记的序言中对于西方诸国的强盛发达深表感慨，呼吁中国卧薪尝胆，力谋自强，以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唐文治炽热的爱国真情，令人感奋。他的门生、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在撰写《漫步巴黎忆恩师》一文中回忆了老师唐文治当年给学生朗读《英轺日记》序言时的情景：“我是 1945 年在无锡国专沪校读书时亲闻唐校长朗读这篇文章的，当时他已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然朗读时声震屋瓦，声泪俱下，其忧国之情，使学生无不为之动容。”

唐文治在清政府商部和农工商部供职时，就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学习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文明，并积极主张扶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以培植国家元气；同时要求“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私营商业，借图私利”。他自己更是严格拒绝一些官、商的赠金，操守廉正。1904 年，他在商部任职时，有人送给他白银二百两谋求职位，他当即掷还；次年，广东一商人赠他白银二千两，也

被他坚决退掉。此间，他还在北京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勘矿总公司等，并呈奏《请设立商会》折，说服慈禧太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总商会，使商人有了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并批准在上海设立商务印书馆、科学仪器馆等文化科学机构。

中国建筑铁路，一向依靠外债。唐文治极力主张自力更生兴建铁路。由他拟定的商办铁路政策中，

把利用华商侨商的财力作为建筑铁路的资金。从此以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后来，清政府邮传部接管了铁路，非但不支持商办铁路，还要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准备把全国的铁路主权拍卖给帝国主义，因而引起了各省大规模的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爆破点”。

尽管唐文治殚精竭虑，擘划中国农工商业，无奈清廷腐败透顶，他所写奏折包括兴办东三省铁路、矿业、水利、商业和收回辽东法权的《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以及《请改定官制》折、《请立宪》折等，都被束之高阁。他深感个人很难有更大作为，便在 41 岁时离开了官场。从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教育救国事业。

1907 年，42 岁的唐文治应邀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他在校内开设铁路专科、电机专科，后又增设商船驾驶科、铁路管理科，并开办机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奠定了以后交通大学作为工科大学的基础。这在交大校史上，乃至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属首创。1911 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 年改称交通大学，唐文治先生为首任校长。不管学校名称怎样改变，前后共 14 年，唐文治先生始终任该校校长，成为上海解放前在交通大学任期最长、建树最多的校长。



他广聘中外名师来校任教,并积极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把一所设备简陋的普通工业专科学校,办成是一所德智体并重、中外基础课并重、工科大学与管理学科教学并重的工科大学,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1920年,唐文治眼病加重,他决定回无锡家居讲学,遂又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并任校长。办学之初,他首先宣布:“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宗旨。”他一再强调:“国家之亡,先亡于无是非;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心不正而能正其身者也。”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课,必由唐校长亲自讲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学生首先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抱负,体现了他“教书先要育人”的教育思想。他因积劳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担任两三门课程的教学工作,需要读课文时,便请人代读;同时坚持著书立说,自己不能书写,便亲自口授,托人代笔。他任该校校长达30年之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该校并入现在苏州大学前身之一的苏南文教学院。以后唐文治先生仍然担任该校的名誉教授,直至1954年4月9日病逝。享年89岁。

唐文治平生自奉甚俭,在上海交大和无锡国专经费困难时,他带头只拿半薪。一旦国家发生大灾,他总是自己带头赈济,并八方呼吁募捐。据统计,在1912年至1943年的31年间,他就组织赈灾并自捐款物十四五次,所赈济地区近及太仓老家和无锡、崇明、常熟等地,远及湖南、陕西等省。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画家朱屺瞻等发起修筑沪太公路及锡澄公路,继而他又会同无锡、江阴知名人士,向有关当局申请以工代赈,用以救济两县灾民。1935年,山东、江苏、河南等省遭受水灾,唐文治先后募捐,交予上海水灾义赈会散发。

1940年,在他75岁高龄时,还和同乡一起组织“积善会”,开办施粥厂,向穷苦百姓施舍米粥。在太仓老家,对少数不能出门的老弱妇孺,他还派专人给他们送上门去。1943年大旱,太仓百姓严重缺粮,他又特意动员商人到常熟等地去买米,帮助近千名孤寡穷人渡过了难关。

唐文治虽属维新派,但他却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后来蜕变成保皇派,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当时除与他人联名电请溥仪皇帝逊位外,还积极支持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前身)学生剪除发辫等革命行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文治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义愤填膺,曾多次在报刊上撰写文章,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敌。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唐文治老先生又率先同张元济、陈叔通等上海10位老人联名致上海市长吴国楨公开信,严辞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爱国进步学生的罪恶行径,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责任编辑 吴思)

## 按需出版 征稿

本广告自去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纷纷来稿要求出版。现将有关基本情况告知如下: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印数在100册以下最合适。

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资金投入:一般在4000~8000元。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看今年本杂志第9第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或赠送。印制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印数多的著述。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作者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手机:13901158422 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 三十年前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

● 王忠人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今年1月8日已经是30周年。

在我的书柜中,保存有我自己装订的厚厚一本《参考资料》(通称大参考),时间是1976年1月9日——18日。这10天《参考资料》的内容,主要是周总理逝世后世界各国各地的反映。我之所以把它单独装订起来,一是有感于周总理的伟大,二是有感于世界各国人民及政治家、社会名流对周总理作那样崇高的评价,实出意料。正所谓“死后更知君伟大。”(叶帅语)

但是,由于“四人帮”一贯反对周恩来同志,当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禁止刊登世界各国的反映,以至国内广大人民看不到这些外电和新华社发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今天重读这本资料,我的心情还是激动不已。我把这10天《参考资料》的这部分内容,加以整理和摘编,奉献于广大读者。

## 一、安理会默哀,联合国和一些国家下半旗志哀,世界各地各大报刊大篇幅地突出报道逝世消息,称颂周总理是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

法新社联合国1月1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会,一开头称颂了上星期四在北京逝世的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

安理会主席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回顾了周先生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们默哀一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发表了赞扬已故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他说:“世界将由于在关键时刻再也得不到他的智慧和政治家风度的好处而蒙受损失”。

中国代表黄华向安理会表示感谢。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所有中国代表团团员都在他们深灰色制服的袖子上佩带着黑纱。

路透社联合国1月9日电 为了哀悼中国总理周恩来,联合国今天下半旗,联合国会员国的旗没有升起。联合国发言人说,这种哀悼方式将持续数天。

在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一位重要国家的政治人物举行葬礼的日子下半旗。先前,只有国家元首享受这种荣誉。联合国对罗伯特·肯尼迪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逝世进行过这种哀悼。

新华社平壤1月10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1月9日通过一项联合决定:周恩来同志葬礼的前一天和当天为全国志哀日。在志哀日全国一切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和农村皆悬挂丧旗。

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之日,全国停止一切歌舞。当天,进行志哀广播。

新华社地拉那1月9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1月9日决定,为悼念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和尊敬的十分亲密的朋友,在1月15日即周恩来同志安葬那一天,为全国哀悼

日。这一天所有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一律降半旗志哀,停止剧院、影院、音乐会以及其它类的活动。

**美联社科伦坡 1月9日电** 斯里兰卡政府1月9日宣布,全国为周恩来总理逝世志哀三天。周举行葬礼的日子(1月15日)为哀悼日,公休一天。早些时候,这个国家已下半旗。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 1月13日电** 巴基斯坦全国为周恩来总理逝世志哀一星期,1月10日和15日举行葬礼那天,全国下半旗。政界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他们有参议院主席、国民议会反对党代理领袖、联邦农业部长、法律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三省省长,西北边境省和信德省的首席部长,巴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商会联合会主席、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还有劳工阵线、塔克西重型机械厂、冶炼厂的建筑工地和巴基斯坦文官学院皆举行集会进行悼念。

(编者注:下半旗志哀的国家,除上述朝鲜、阿尔巴尼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四国外,还有坦桑尼亚、阿富汗、孟加拉、越南等国。)

**路透社华盛顿 1月9日电** 美国报纸、电视和电台都把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作为头等重要消息来报道。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以宣布他去世消息。正常的新闻广播时间有许多被用来介绍他的生平和即将进行的领导更迭。

**美新处华盛顿 1月9日电** 美国几家大报,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都以超过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周总理的卓越政治生涯的文章和照片。各大报的标题有:《周这位独一无二的总理,是屹立在不断变动的潮流中一块坚定的岩石》、《周恩来的灵活性使一场战争得以避免》、《周被视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努力中的杰出的组织者》等等。

**新华社巴黎 1月9日电** 法国各报以显著地位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述周总理逝世。各报均介绍了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周的高尚品德和非凡的才能。

《法兰西晚报》在第一版第三版显著地位发表文章。

《世界报》用近五个整版,发表消息、反映和

介绍生平。

《十字架报》头版头条登逝世消息,左上方登周总理照片,第三版介绍生平。

《南方电讯报》用套黑大字标题发表消息和照片,并刊登几位名人谈话和文章。

《西南报》刊登消息、照片和文章。

《费加罗报》第一版发表消息和照片,第三版发表谈话和文章,又刊登蓬皮杜总统访华时与周总理在一起的照片,第四版发表反映。

《震旦报》头版右上方发表消息和照片,第三版发表长篇文章,并登二张总理国内活动照片。

《巴黎日报》以大标题发表消息并配发照片和社论。

《人道报》一版发表消息照片,三版发表文章。

**新华社东京 1月9日电** 日本东京各大报1月9日晚刊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和周总理半身遗像。各报并用4-6块版篇幅编发了大量评论、悼念文章、座谈记录和周总理各个时期的照片。

《读卖新闻》六块版

《日本经济新闻》四块版

《每日新闻》六块版

《东京新闻》四块版

《朝日新闻》六块版

《产经新闻》五块版

日本各电台、电视台也以“特别报道”的形式连续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位共同社记者对中国驻日记者说,“日本报纸电台用这么多的篇幅报道一国领导人的逝世是罕见的,这表明周总理在国际上影响之大以及日本人民对他的爱戴”。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正好当天下午到达东京,各报对这一消息都安排在第一版左下角一块很小的位置上。

**新华社香港 1月15日电** 菲律宾《今日公报》1月15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周恩来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人格高尚,使人们今天忘记了政治上的分歧,甚至那些同情台湾政府的人也来这里对他表示悼念。中国大使馆灵堂和各个大厅里摆着数以百计的花圈,其中有一个就是人们普遍

认为亲台湾的菲——中(台湾)协会中心送的。该会还派了以执行副会长为首的代表团去吊唁。

香港《大公报》14日刊登一则新加坡专讯说,至13日为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已收到当地各界致送花圈数百个,吊唁周总理。接待的一万多名吊唁者中,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有八千多人。

新华社香港1月11日电 《明报》1月11日又以《行高于众,功高天下》再次发表社评。文中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世界除了莫斯科和台北以外,所有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同声悼惜,称赞他的品格和贡献。苏联与台湾虽激烈反对中共,但对周恩来个人也无贬辞。苏联发表了极简短的唁电;台北的发言人则说: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的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个人。对于周氏个人,这已可说是最大限度的赞扬了。这样的表示固然相当得体,但也显得周氏人格感人之深,即使是敌人,也不禁对他深有钦佩之情。

#### 附录:报刊标题集萃

巴基斯坦《黎明报》1月10日社论《一位伟大的亚洲人》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人民报》社评《中国一位领导人的逝世,引起了世界悲痛》

印尼《独立报》1月12日社论《新中国是毛和周创建的》

伊朗《德黑兰日报》1月10日社论《世界将把周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永远铭记在心》

墨西哥《日报》1月10日社论《周恩来,当代的一位伟人》、《国民日报》一版四栏标题《一位推动第三世界历史的领袖》

埃塞俄比亚《新时代报》1月10日社论《伟人逝世》

圭亚那《纪事日报》1月10日消息《周一全世界哀悼》、评论《富丽堂皇的功绩》

南斯拉夫《新闻报》评论《首屈一指的外交家》

阿尔及利亚一机关刊物《非洲革命》文章《周恩来:第三世界失去一位自己人》

《科威特时报》1月11日消息《世界赞扬现代中国缔造者》、社论《失去一位朋友》

法国《南方电讯报》1月9日文章《既坚定又灵活的钢铁性格》

法国《红色人道报》1月13日社论《周恩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朽的革命榜样》

西柏林《每日镜报》文章《中国外交大师》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月16日文章《回忆周——很有吸引力的革命家》

日本《经济新闻》1月9日文章《四分之一世纪的顶梁柱》

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文章《周恩来——罕见的革命家》;1月10日晚刊评论《外交上的超人周恩来》

香港《星报》1月10日短评《杰出领袖去世,全球同感惋惜》

《澳门日报》1月13日消息《葡籍人士悼念周总理》

## 二、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盛赞周总理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盛赞他在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各国和平共处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美新处华盛顿1月8日电 白宫1月8日公布了福特总统在听到周恩来去世消息以后发表的下列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美联社华盛顿1月9日电 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就周恩来去世发表正式声明:我获悉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若有所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它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我曾荣幸地同周总理进行过多次会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效力于本国的利益,他深刻理解世界局势,他难能可贵地既有敏锐智慧又有个人魅力。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 1月8日电** 尼克松在一篇声明中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他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悲痛。

**共同社东京 1月9日电** 三木首相9日对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发表了总理大臣的谈话:今天,在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阁下逝世的讣告时,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我对周总理的卓越见识和对日中友好关系世代代发展下去所寄予的那种非凡的热情,直至今天仍深为感动。在此为周总理阁下祈祷冥福,同时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

**时事社东京 1月9日电** 前首相田中发表谈话说:周总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困难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周总理曾留学日本,体验过日本的生活。也是一位完全了解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代的日中两国一切问题的人。我认为周总理是为数不多的知日家。我访华时周总理曾对我说:“我是在神户乘货船从日本回国的”。并问我:“上野的森林现在还有

吗?”“神田的书店街怎样了?”从这些话语中,我曾期待周总理有一天会访日,但现在已不可能了,令人遗憾。

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

**路透社伦敦 1月9日电** 英国首相威尔逊今天就周恩来逝世发表声明。声明说,他获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深为悲痛。周总理作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缔造人之一和作为一位卓越的国际政治家而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英国人民将尤其要把他对发展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贡献铭记在心。

**路透社伦敦 1月8日电**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说:在过去两年中我曾两次到中国。周在西方受过教育,了解西方,并能在西方政治家和中国人之间自由地行动。他是一位伟大的谈判家,一位十分老练、智力过人和具有巨大影响的人。

**新华社巴黎 1月8日法文电** 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品



周恩来灵车驶过长安街,北京民众自发送灵



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和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原因。

**德新社慕尼黑 1月9日电**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就周恩来总理逝世发表声明: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一次非常难忘的谈话中,我亲自听取了周的才智横溢的见解。周对政治现实的认识,不仅对西德政策目标有非凡的了解,而且他还鲜明地表达了对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欧洲的关注。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如下事实的政治家之一:我们今天的世界再也不能由两个超级大国来统治;超级大国必然受多极法则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与反抗外来压迫斗争所制约。

施特劳斯在声明中断言:上述思想中蕴藏的力量肯定在未来是有效的。

**新华社波恩 1月10日法文电** 西德《世界报》以《周——一位用有弹性的优质钢做成的人》为题发表外交家施罗德的谈话,他说“周恩来的去世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人的去世”,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他以镇定自若和给人以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得有经验和个人造诣。对新的事态发展绝对有信心。1972年7月19日,在北京我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论德国,这就是那次谈话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新华社布鲁塞尔 1月10日法文电**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当我同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我对他的机智和敏捷,他的幽默感、智慧和他对国际政治的了解非常吃惊。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 1月11日电** 巴基斯坦新闻部昨天深夜发表布托总理的声明:周恩来总理逝世使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感到深切悲痛。我有幸非常熟悉周恩来总理已有15年。周总理在谈判中表现出深刻了解地理政治因素,很有气魄。使我们能够把中巴关系置于持久友谊的基础上。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时代的杰出的革命家之一。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对各国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一个反帝战士,在当代伟人中他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

可靠的朋友。他对我国人民的不断关心,他对巴基斯坦事业的大力赞助,使他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心中。

**法新社科伦坡 1月9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在我个人对他的逝世感到若有所失的同时,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一贯的、真诚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享有最高声望的世界人物。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周先生是一向鼓励它们努力摆脱外国控制的巨大鼓舞源泉。

**拉丁社墨西哥城 1月8日电**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书面声明中说:墨西哥人民对失掉一位领袖深感痛心。周恩来一向发挥他的祖国的威力和道义权威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对和平共处和促进国际正义作出了根本的贡献。

**新华社乔治敦 1月9日电**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说:周恩来同志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

**法新社堪培拉 1月9日电**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说:周总理是现代世界史上的巨人之一。周和毛泽东一起,体现了和表示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统一和国际尊严的愿望。

我对他的魅力、他的仁爱、他的精力和他的远见有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位非凡的人。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1973年两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同他会谈两次达20个小时。

### 三、知名人士,社会名流以述说亲身体会的方式追念周总理知识渊博、才智过人、朴素谦逊、诚恳待人的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

**纽约新闻社纽约 1月9日电** 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接见记者时说:“我要对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位伟人——的逝世表示悼念。我们不能忘记,伟人不管在哪里都是伟人,失去他我们都受到损失,周恩来是国际上的伟人。”费正清把周恩来逝世对中国的损失,同富

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对美国的影响相比。他说,周最伟大的品质,除了他的行政管理才干以外,就是他求得妥协解决并调和针锋相对的利益的能力。

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1月11日米尔克斯的文章:自1946—1949年将近三年时间内,我认识了和观察着这位谈吐文雅而热情认真的红色领导人。马歇尔将军同周恩来会谈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马歇尔有一次说“这位身材细瘦、头发乌黑的共产党人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有才识者之一”。

美联社东京1月9日电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谈他多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周恩来才智过人,有吸引力,学识渊博,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

许多总统、国王、首相、总理或一般人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谦逊的态度和他的仪容吸引住了。钦佩他的人有马歇尔、基辛格和前总统尼克松。

1947年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在延安会见了周,我同周以后一次会晤是在过了24年以后,地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尽管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在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选手中认出我了,我当时被派去中国报道乒乓球队的活动。

他同我握手时说:“罗德里克先生,欢迎你再次来中国,好久没见了。”接着他指着明亮的大会堂叙旧式地问:“罗德里克先生,我们现在比延安时候怎么样?”我点头回答:“是比我们那时住的窑洞好”。

法新社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月9日电 斯诺夫人发表谈话说:周恩来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他很英俊、很开朗、很坦率和友好。他很少讲英语,但曾经在法国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是一个温和派,一点不反对西方,他老早就希望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设计师。

新华社日内瓦1月10日法文电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说:我同周恩来会晤过十来次,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说真理,他是平静和合乎逻辑地说出真理。他有无限的耐心,他想以理服人。而且当他听到没有理论的话时他从来也不生气,然

后他说,那好吧,你再想一下吧。

周总理的记忆力是非凡的,1971年当他接见我的丈夫(他是印度人)时,他谈到喜马拉雅山所有的峡谷高度和名字……十年前,他曾同一个外国人士简短地谈过话,十年后,他在一次大宴会上碰到这个外国人,总理从他的桌边站起来,去见这个人。他对这个人说,十年前我们讨论过某某事情,你是对的,我错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特别敬佩。

法《西南报》1月12日佩雷菲特文章:政治天才是存在的,周恩来就具有。他的天才,主要在于对形势的透彻理解,顽强与巧妙相结合。这是伟大政治家们的特点。礼貌周全,专心而热烈,灵活而顽强,了解一切事物的细节,并且明了全局,这就是这位精干的、来自旧社会而献身于新社会的革命家给我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刊登大松博文的谈话 作为排球教练曾四次访华,训练了中国女子运动员的前众议院议员大松博文说:这是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访华时候的事。周总理到北京体育馆看我们练习,那时,可能是他碰巧看到我打运动员屁股,后来他在休息室里一见到我就笑着说,解放后中国有条法律,就是不准打人。身为总理的我请来的大松先生,这样对待运动员,她们要是说责任在我,那我就不好办了。

当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衣服的袖口,在破了的地方补着一块补丁。我会见过各式各样的重要人物,但从未见过一个穿这种衣服的国家领导人。我早就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严格、卓越兼备的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再次使我感到他是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的人。

日本《产经新闻》1月9日登该报记者林慧儿的文章:“会见周恩来总理以后,不得不痛感到自己是多么粗野。”这是1954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会见了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周总理后所说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都还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但是同莫洛托夫(苏联)、艾登(英国)、杜勒斯(美国)这三位外长相比,围住周总理的西方记者比谁都多。他那庄严的语调和有魅力的举止不能不吸引很多人。

(责任编辑 吴 思)

# 难忘的一月八日

● 董克发

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今年的1月8日是总理逝世的30周年纪念日。总理走了30年了,但很多往事仍深深的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那是1967年的1月8日,天气很冷,应全国劳动模范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请求,周总理答应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北京的全体人员。会议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发表了讲话,本人有幸聆听了这次讲话。

北京工人体育馆1月8日晚聚集了全国石油系统的数千名员工,有工人、有干部、有学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批判石油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横幅。主席台对面贴着“打倒余秋里”、“打倒康世恩”的大字标语。

时针指向7点30分,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代表(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出来向大家解释:“周总理问会场内贴的什么标语,我们汇报了,周总理不同意,要求把打倒余、康的标语撕掉,大家同意不同意?”,接着就有不少人跟着起哄,“不同意”。主持人又回去商量,大约几分钟后,主持人又向群众解释:“周总理说不撕掉标语,他就不讲话,大家同意不?”经过两次折腾,主持会议的那些人终于同意撕下了会场内的大标语。至此开会时间已被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大约在8点10分左右,周总理来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王铁人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周总理就向与会的石油工人发表即席讲话。那一天他准备讲三个问题,全场数千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大约讲了30多分钟,台下有一个造反派突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下面也有部分群众随之呼应,唯独周总理不举手,不随声附和,而是背对着群众,面向毛主席画像。等大家喊完之后,他随即转过身来对大家讲到:“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

使我很不好办,刘少奇同志还是中央常委,有意见可以提,呼喊这样的口号不合适。”

由于会场气氛不是太好,周总理看起来真有点生气,同时也很疲惫。经过一个小时风波后,总理继续讲到:“老同志我就是要保,保不了我就不保了,不光是刘少奇,还有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我都要保,有不少老同志还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他们很辛苦,又要工作,又要接受批判。”随后他又讲了余、康的问题,讲了余、康开发大庆油田的功劳,他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今天凌晨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第一个冲上去,劝大家回去,到大会堂座谈,我一天只吃几片面包,睡觉不到两小时,我为了谁啊!我不是为了毛主席嘛!”讲得大家非常感动,台下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喊到:“总理坐下讲”,周总理说:“我坐下就打瞌睡了”。总理又继续讲着……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位工作人员给周总理耳语了几句,接着主持人向大家解释,中央让总理回去开会,会议就此结束了。要讲的三个问题也只讲了两个。

30年来,自己总想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出来,今天终于实现了,以此作为对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通过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可以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谋略、他的品德、他的为人。

(责任编辑 吴思)

## 敬告读者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1943年5月,侵华日军为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武装,出动重兵对太行山区的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涞源等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5月7日,日寇在完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野场石沟惨案。

1943年5月1日至7日,日伪军从四面包围了完县西北山区,并驻扎在周围山上。他们每天下山到处搜索,企图毁灭八路军后方机关。由于抗日军民早已做好反“扫荡”准备,进行了彻底的“坚壁清野”,部队转移,群众也都隐藏在山沟里,敌人扑了空。抗日军民积极配合,神出鬼没,伺机打击敌人,使敌人寸步难行,连水都喝不上。

敌人气急败坏,5月7日清晨出动100多人,从四周朝野场围拢而来,边吼边用石头往沟里砸。在石沟掩藏着野场等四个村的老百姓近200人,被驱赶到石沟靠山坡的一个小块地埝里。他们怒视着山坡上的敌人,男人们沉默不语,妇女和小孩子慌乱地呼喊着亲人,紧紧靠拢在一起。

翻译说:“你们不要怕,只要说出八路军在哪里,枪支、子弹、鞋袜、衣服藏在哪里,就饶了你们。”

人们低头不语。翻译官连着说了几遍,谁都不吭声。翻译又喊:“说不说?不说就开枪了!”

一个妇女骂道:“我们什么都有,都被你们这些强盗抢光了!”气得日军上去把她刺倒了。翻译又紧逼威胁:“知道不知道?不说就开枪了!”群众一起回答:“不知道!”

翻译狞笑着说:“哈哈!你们边区的老百姓真坚决呀!”他向日军摆了摆手,一个日军恶狠狠地说:“杀不完老百姓,就杀不完八路军。统统的是八路!”敌人真的下手了,随着重机枪的叫声,无辜的群众倒下了。

两次扫射之后,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在尸体中翻腾,见有活着的就用刺刀挑死、戳死。一个婴儿爬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日本兵竟用刺刀把婴儿的两只脚掌全削掉了。

野场惨案,有118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下,有54人受重伤,其中妇孺占死伤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仅野场村就有王长合、王喜亚、王德子、陈亭儿四户全家遇难。

在这场大惨案中,有一名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婴安然

# 在日寇大屠杀中幸存的婴儿

● 王纯 口述 邹瓚 整理

无恙。女婴叫廖茜茜,父亲是八路军某部作战科长,母亲冯景新是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校的护士。小茜茜出生八天,被寄养在完县野场村名叫杨桃儿的年轻农妇家里。杨桃儿聪颖善良,朴实醇厚,耳闻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看到共产党、八路军舍生忘死打鬼子,从心眼儿里拥护共产党,爱戴八路军。杨桃儿的小孩因病夭折,她对对儿子的思念,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深情厚爱全部倾注在小茜茜身上。

5月7日凌晨,杨桃儿抱着不满周岁的茜茜同乡亲们一起被敌人驱赶到野场石沟地埝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她想的是茜茜的安危。她挤到人群中,解开衣襟将小茜茜裹在怀里。人们自动形成了一道人墙,挡在桃儿母女俩前面。村长的媳妇张竹子、儿童团团长王璞和其他乡亲们也都用身体遮掩着小茜茜。

凶恶的鬼子开枪了,杨桃儿用身体挡住了子弹,不幸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身受重伤的杨桃儿怕孩子啼哭被敌人发现,便挣扎着用奶头堵住小茜茜的嘴,并用受伤的躯体挡住小茜茜。

弥留之际,她将随身仅有的两张边区钞票塞在小茜茜衣服里,并对身边受重伤的乡亲说:“这孩子是八路军的女儿,她的母亲叫冯景新。要想办法把她交给她的父

母……”

惨案发生后,晋察冀边区三专署抗日联合会主任王纯(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奉命率部赶赴出事地点。在整理遇难乡亲们的遗体、遗物时,发现了浑身血污、幸存的小茜茜。她伏在奶母杨桃儿的怀里,嘴里还含着奶母已经冷却的乳头。王纯和前来营救乡亲们的战士看到这个场面,都潸然泪下。

后来几经辗转,王纯终于将小茜茜送到她母亲冯景新的怀抱。现在,冯景新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白衣战士已离休,昔日的小茜茜如今的廖雁北,已成长为首都友谊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廖雁北大夫感慨万分地说:“是奶母杨桃儿用乳汁养育了我,用生命掩护了我。完县人民和八路军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忘不了完县,忘不了我的完县母亲——杨桃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 陆 德

##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梁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梁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

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

于光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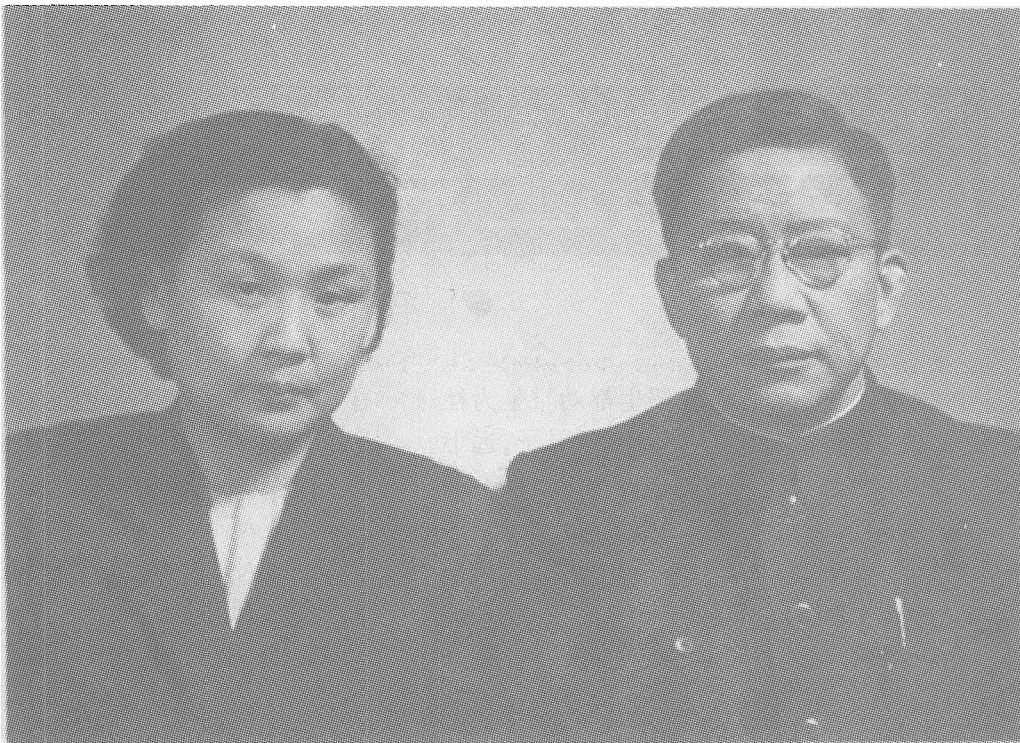
父亲陆定一1996年去世，遵照他的遗嘱，2002年将他的部分骨灰撒放于家乡的马山。魂归故里，完成了父亲的宿愿。

无锡市的西河头，一所老宅，有上百年的历史，是陆定一少年居住的地方。无锡的现代化建设，在老宅的数百米远处，建筑了辉煌的希尔顿大酒店，一古一新，房地产商愿出高价，拆掉这所老宅。此事在家乡引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有碍瞻观，主张拆掉；另一派认为是陆定一故居，且属古建筑，在市内已不多，应该保留。为此，市里专门邀请全国有名的古建筑家，来无锡进行



鉴定评估。此事，却引发了一件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

2004年，我第二次回家给父亲上坟时，听我表妹严冬冬告诉我：专家们对故居进行了评估，北京来的专家的意见和看法，还在当地报刊和电视台播出了。专家讲，此古宅所以要被保留，不仅是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底蕴，在无锡已残



陆定一、严慰冰夫妇，摄于20世纪50年代

存无多，更主要的是陆定一挺身保护了北京的故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同意让人拆掉陆定一故居。专家讲，当时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但被陆定一拼死上谏，才使北京故宫得以保全。

关于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风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平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近日，偶得《作家文摘》的一篇报道《故宫80年》，才把前后几件历史事实串接了起来。

此报在《故宫80年》中报道：

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透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提出（由于）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故）要对它“进行改造”——

（要）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故宫一分为二），并将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当时的中宣部陆定一专门（为此事）召开了处级（注：文革前中宣部除部长外，下面直接就是处室，不设厅、局。其处的级别，比现今的处级高许多）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这一问题。谢辰生说，从传达的文件中他得知，当时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故宫就是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反映）封建落后，“（对）这个地方不能搞现代化，我看，一万年也不要在那里搞电灯。”陆定一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长以上的都是（保护故宫建筑的）保皇党。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在亦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中宣部将此意见反映到中央和相关部门，中央当时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终于否定、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使故宫一直保留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人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仅以此篇文章，怀念父亲陆定一诞辰99周年。

#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

● 冯东书

中国历代好心的大臣和儒生都劝君王为社稷着想,要“亲贤臣,远小人”,要“近君子,远小人”。但是,历代君王多会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有些好心的人遇到这种事,总是为君王惋惜,以为是君王没有看清小人的真面目,上了小人的当,用错了人。

其实,稍微懂事一点的君王,都懂得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君,都要识人,都要“近君子,远小人”的道理的。

那为什么从古到今,做君王的(不管他叫不叫君王)总是要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呢?

这就因为他们有重用小人的需要。

历史上的皇帝,是不可能民主意识的(在欧洲的一些君主立宪国王除外),他们掌握国家权柄,不仅要保持自己的终身统治权,还要把权力传给后代,一直世袭下去。为此,如果他开明的话,自然要用一些品德好、威望高、能力强的贤臣来帮他治理国家。同时,他也必然选拔一些能当打手、心狠手辣的鹰犬放在自己身边,以对付他怀疑对自己有不轨之心的大小臣子,如汉武帝重用酷吏杜周。武则天多聪明!她不知道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坏?索元礼冤杀数千人,人畏之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那个发明“请君入瓮”的人,酷刑逼供,冤杀了一千多人。周兴陷害过数千人。武则天那么聪明的人,能一点都看得出来?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最后又把他们统统处死了?时机成熟了,她就会杀他们的头以平民愤,收人心。时机不成熟,她还要用他们来打击她的反对者,或仅仅是怀疑中的反对者。

特别当一个君王有了大失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反响,而自己又不愿承担责任,不愿认错,他当然知道会有人不满。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

有人会借此机会联合一些人推翻他的统治。于是,“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对他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小人会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去消灭对君王不满的人,或被怀疑为可能对君王不满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曾对社稷有过大功,也不管搞掉这些人有没有证据。这些小人在为君王排忧解难时,当然要趁机消灭打击他们自己的对手和不喜欢的人,既遂了君王之所好,又达到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一个赞成实事求是,讲究重证据,讲究公正的贤臣,能满足君王的这种特别需要吗?当然不能。

比如宋高宗要推行他的求和路线,能让岳飞这样主战的贤臣强将一个劲向北打吗?他为了自己坐江山的需要,也只能用秦桧这样的小人。秦桧自己怎么敢又怎么能害死岳飞这样威望很高的大臣?而有良心的贤臣又不愿意干。宋高宗也只能用心狠手辣,昧着良心干事的小人去干这种事。

君王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欲望。如唐高宗李治要娶自己父亲的小妾武则天作妃子,这是乱伦的。唐玄宗李隆基要把自己的亲儿媳杨玉环夺过来作自己的老婆,这也是乱伦的。一般知书达理的贤臣君子怎么能帮他们干得了这种缺德事?不仅不会帮他干,还会劝他不要干。这也必须靠阿谀奉承的小人出馊点子,做手脚,才能办成。

君王打天下夺取政权时要依靠一批能人,没有他们难成大事,但成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又是一件难事。他们是能人,打天下需要他们,打完天下,他们高超的才能和威望以及他们都有众多的部下,就会使君王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如何处置这种能量大的功臣呢?这也不能靠贤臣和君子,只能靠小人来做手脚。

唐玄宗用酷吏吉温和罗希奭,他心里明白得

很。他也说过他们不好,但还是重用了。唐玄宗欣赏他们的行为,放手让他们屡起大狱,弄得人人自危。正是这样,唐玄宗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君主形象得到了升华,皇位得到巩固。等到唐玄宗的目的达到以后,把吉温处了极刑,罗希奭被发配到蛮荒之地。他对大臣说:“朕受人迷惑,用吉温至此。”“今已将他斥退,卿等可高枕无忧矣。”小人又成了君王的替罪羊。于是,大家又要欢呼皇上圣明,为民除害。皇上在政治上又捞了一把。

君王利用小人做的坏事多了,他就怕有人和他算账,怕人民推翻他,他就越要利用小人来保护自己的统治权。他这样做,当然也怕“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势力因此坐大,危及自己。这时他就会不断用这一茬小人搞掉那一茬小人,然后过些时日,又用下一茬小人搞掉这一茬小人。

这是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现象。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6.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6.00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50.40	6.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5.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6.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6.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6.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5.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	38.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6.00
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	龙德成	28.00	5.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 1600 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大包干。作者参与了农村重大变革的核心决策。本书记载了亲历、亲闻、亲见,而且语气简练,生活具体,见解深邃,如作者著名的演讲风格,对于想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人,本书堪称宝藏。

《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忆旧》本书的内容多属于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作者回顾了六十多年来的主要经历,以历史责任感的情怀,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史实,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研究。读后定会使人有所收获和思考。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 20 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 “实事求是”考源

● 甘惜分

“实事求是”这个词语,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且人人会说。

但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到底出自何处?也许有人考证过,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有“实事求是”这样的字吗?当然不可能有。这是古汉语,西方不可能有。自古以来,只有中国人善于提炼出最简易的词语表现极为丰富的思想,而外国人最讲究写厚厚的大书,一写就是几大卷。

在中国,最常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语的据我所见是毛泽东。我记得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曾用“实事求是”来阐述整风的意义。

我近日查书,毛泽东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开始运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批判种种不良思想倾向了,他批评一些人写文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另一处,他要求做研究工作的干部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并且对“实事求是”一一加以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那时起,“实事求是”四字就经常在报刊上出现,逐渐成为全民的惯用语。

但是毛泽东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没有说明这是他的创造,还是借用别人的语言,以至于几十年来人们都把这四个字视为毛泽东的创造,称颂它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来没有为此事作过一次辨正。

我查了班固著的《汉书》,终于弄清楚了,《汉书》五十三卷“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2410页)

但班固著作中并未对“实事求是”这句话作出解释。到了唐代颜师古为古史作注,他对“实事

求是”注:“务求事实,每求真是也。”(同上页)

这就是“实事求是”最原始的出处。颜师古的注释也是简而要的。

毛泽东是爱读古书的,他可能很早就把“实事求是”这个词语牢记于心。他在内战、抗日战争中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注重调查研究,万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各方面的情况作周密考虑,作出决策,作到真正的实事求是,才取得了战争和工作的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毛泽东笔下的“实事求是”已经被改造了。颜师古对班固的注释只是说刘德(即上述的献王)的“实事求是”,而未及其他。毛泽东却不但在“实事”二字上下功夫,而且对“是”字下功夫,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这就是毛泽东对古代文化的改造,使古为今用。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才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确认客观事物在先,人对事物的认识在后,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一旦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又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推动世界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意思是一致的。

班固著《汉书》,颜师古注《汉书》,他们想不到他们笔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在两千年之后被后人稍加改造,竟然如此辉煌,成为中国人民建党、建军、治国之本。几十年来,“实事求是”已普及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公民心中,成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几十年来,我们党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战略决策,就是创造性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结果。

但是,也有人高喊“实事求是”而干了许多反“实事求是”的事情。“实事求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实际上走到了“实事求是”的反面。

(下转 76 页)

# 医多不治帝王病

## ——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

● 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帝王病”。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骥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



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煥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欽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 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

过三剂。”言论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困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

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貽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

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师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8月27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



光绪皇帝像

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6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祿，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

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匱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调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账。

##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

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什么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祿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曰：“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曰：“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煥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

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煥、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11月14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煥、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责任编辑 吴思）

# 告别科举的曲折

● 王 毅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即清政府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等人建议,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改行“多建学堂、普及教育”的新式学校教育。由此,中国自隋唐后施行千余年的科举制被废止,从而开始了全面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进程。今天回顾和体会这百年间教育发展的历程,仍可从中得到教益并生出许多感想。

##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危难中的起步

中国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和试图维新之后,早已弊端百出的科举制必须改革越来越成为朝野共识,直到“戊戌之变”的1898年,康有为奏请光绪变法时仍强调:“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先于改科举!”而此前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同治年间即开始一系列引入现代教育制度的尝试: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培养翻译人材的同文馆,除外文之外逐步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天文、物理等课程;从1872年30名学生赴美开始而创立留学生制度;各省改旧式书院寺院为学校;创建“船政学堂”、“自强学堂”、“中西学堂”等新式高等学校;1898年诏令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主管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和“管学大臣”(后为“总理学务大臣”),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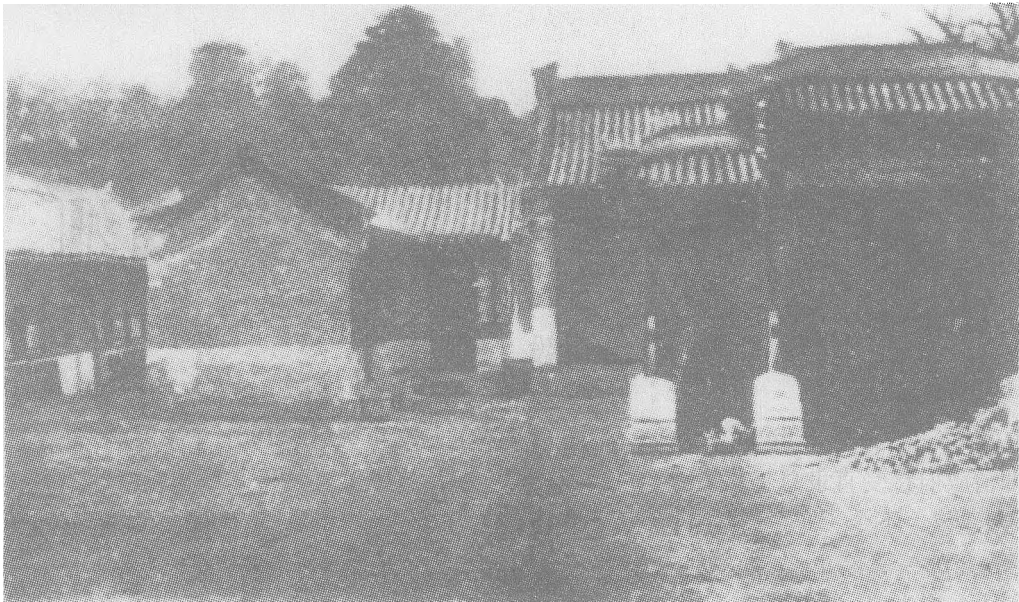
引入新型教育的努力曾因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兴起而遭重创——例如义和团的切齿讨伐:“闻同文馆洋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不过经历了庚子之祸的国人对蒙昧误国有了极真切深痛的认识,由此使

改革教育的呼声更强烈。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疏详论育才兴学,其结论归结为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年底,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并责成他草拟《全国学堂章程》。张氏参考欧美日本教育制度,详细拟就此章程,并于次年七月由清廷颁布,即《钦定学堂章程》,是为对中国新教育体制全面设计之始;后经张之洞重拟、并于1903年颁布。总之,经数十年艰辛而至1905年废除科举,教育的革故鼎新成为了当时制度文化变革中影响最广泛深远的领域,其结果终于使新式教育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旧教育制度,从而为中国新的政治时代和文化时代到来准备了条件。

## 中国教育确立现代理念、告别科举宗旨的艰难长路

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进程是在窘迫中起步,其进程的极尽曲折远未因科举之废就告一段落。比如1917年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中说:“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又如因国民无权支配国家财政,所以经费窘迫严重制约教育发展,1919年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忆曩年游美,彼纽约一市之教育费,当吾全国而有余;嘉南崎氏一人所捐于一大学之基金,又当吾全国而有余,苟论人国者必欲以教育程度之高下第其文野,则吾中华民国人民果何年得与世界列强相见耶?”

而更深刻的危机同样很快凸显,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宗旨与统治者权力意志之间的根本冲突。



京师大学堂

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宗旨为代表，现代教育理念得到广泛传播，比如蔡元培指出现代教育就是要消弭中世纪文化“攻击异教”的专横偏狭和对国民自由个性的压制，促进全体国民健全人格的育成，并且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教育也因为摆脱了中世纪的迷信和专制，所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基于这种理念，蔡元培反复强调教育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要反对以党派私利凌驾和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独立议》）他在1912年起草教育部“学校法令”时特别申明：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可见他期望的，是中国也能像“共和时代”世界先进国家共同遵行的准则那样，使教育摆脱千百年来以统治者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曾说，这一传统乃秦汉以后中国教育的根本宗旨。

然而由于中国的制度环境，现代教育准则的

实现备受阻遏、屡遭挫折，而以圣人和权力者之是非为是非的科举式教育理念，却总不难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较早的典型事例，如1901年以后“新教育”纲领中仍强调以“忠君”为最高宗旨、以读经为首要课程，在教育方针上仍推行“干涉主义”。而

后来国民党大张旗鼓实施的“党化教育”则更直接悖逆于现代教育的方向。关于“党化教育”的宗旨，孙中山晚年《致南洋三宝雁学校成立祝词》概括为：“吾党主义，是曰三民。揭橥理则，地义天经；敷为教育，本正源清。勗哉诸子，竭蹶陶成”——意为自己一党之主义因其垄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事物，所以不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且尤其必须将它尊崇为教育的源泉、推广成为陶育普天下一切学子的终极理念。1927年1月，蒋介石在“江西讲习会”上强调，因为“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所以必须将其灌输给青年学生；而直到1939年他宣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其核心仍是以“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基准”。

与科举时代“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育宗旨通过皇权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等手段而推广一样，“党化教育”也是被强大政治威权灌输的：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广东模仿苏联，规定一切学校如不遵行“党化教育”就一律取缔，“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支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次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党化教育正式标准，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必须融会党义精神，每周必须讲授党义课（私立学校中此课



也要列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每个中国教员必须在每周举行的仪式上宣誓“服从党义”等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当时即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这不仅大悖于“以人为本位”的现代教育原则,而且是复辟了中世纪制度: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这种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

直到抗战结束后,教育家陶行之仍然疾呼:“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可见废除科举之后虽经漫长时日,但是使教育成为“国家公器”而不是沦为“一党一派的工具”,这仍是需要恒久努力的目标。

## 科举曾经具有的重要制度功能

一百年前,科举制在一片诟病声中再难支撑;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深广的一种制度,它却长久地承担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知识传承的功能。那么后人应如何看待其是非功过?

简单说来,科举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制度建构之一,原因在于自秦确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体,要求经济、教育、伦理、行政官制、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也要相应地建立起从属于皇权的运作体制。而这众多的亚层制度都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行始终以皇权为轴心而不会导致“王纲解纽”,二是能够通过一套宏大有效的政务程序,使皇权这金字塔的顶端能够顺畅自如地控制社会,使众多社会阶层及其利益诉求得到尽可能有效的调控整合。

在国家制度的一切重要领域都建立起兼具这两项功能的运作体系,当然是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以教育和官吏选拔而言,虽然早在秦汉,统一皇权国家的制度方向即已确立,但在以后漫长时期里,官吏选拔过程和文化教育的领导权却经常

为高门大族操控,因而不能统一稳定地从属于皇权,并由此直接间接地不断造成“王纲”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整合危机(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详的说明)。而只是在隋唐确立科举取士以后,上述危机才通过有效制度程序予以克服,其结果就是国家的中枢制度、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拔调配制度、全社会文化教育的领导权和价值取向等等,开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一运行,即唐代人所说:“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

所以不仅如前人所言,通过科举将下层士人选拔到国家管理层,这对于平衡各阶层利益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科举的更深刻作用在于:以往非常分散的社会文化形态和众多知识精英、统贯国家肌体要冲的行政脉络、最高权力中枢,这三大层面的协调统一,对于将庞大皇权国家导入平稳成熟的程序轨道是绝对必须的。所以康有为吁请光绪废除八股的奏章中,他仍然留恋地指出中国的科举选士曾经远优于欧洲中古的贵族制度。

## 科举等前现代和逆现代的教育体制,它们共同核心是什么?

科举作为一种效用广泛强劲的粘合剂,将以往可能离心的社会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取向,尽量包揽无余地吸附固着在皇权及其行政体制周围,由此而聚集的巨大制度动能,对于宋明以后皇权在生命力衰减情况下维系传统制度模式,愈加成为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同时,随着作为科举基础的皇权政体日益专制,一切附属制度也就越来越失去相对独立的空间,越来越把巨大的制度成本糜费在支撑这日渐颓朽的大厦上,而不可能转而探索发现新的方向。如《清史稿·职官·三》所说:“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可见对教育的主导操纵(“立教”),被彻底纳入包括法律、经济、宗教、社会协调等等“靡所不综”的一体化控制系统之中,由此不允许教育有最低限度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此构架下,教育不仅只能如蔡元培所说“专制时代”教育家遵循权力者意志、不能确立其独立崇高的品格,而且一系列由更根本制度之祸

导致的教育弊端也不可避免。例如,腐败是科举时代教育学术制度中除了读书内容空疏无用之外最怵目的丑恶现象,至明清后更发展到有科举必有腐败、读书者较常人更狡诈贪婪的地步。百姓的形容是:“读圣贤之书,精盗贼之事;开口尧舜周孔,梦寐时共、鯀、苗、驩(共工、驩兜等都是凶顽之徒的代称)!”虽然明清统治者为了整肃科场反复动用严刑峻法,但因科举如疽附骨一样寄生在已充分腐溃的权力体制上,所有治理努力都成了天下的笑柄,这在《儒林外史》等作品中有无数生动事例。

而与现代教育更深刻的悖逆还在于,科举等依附统治权力的教育体制以强制方式规定:天下一切知识谱系和知识准则的源头,都只能来自统治者的政治权威。康熙皇帝《日讲四书解义序》说得最明白:“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他在《训劄士子文》中申明的教育制度方向乃是:天下学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皇帝满意(“以副朕怀”)。

圣人(皇帝必是圣人或准圣人)既是普天天下的统治者,也是“万世道统”和最高道德的代表,同时又是亿万子民必须躬承其教诲的“师”。由此而至高无上的制度定势就是:有权力者必有知识、有权力者必有真理、有权力者必有道德!在这种知识谱系中,亿万子民永远不可能企及知识和道德的本源;而只能日复一日揣摩、贯彻统治者兼圣人颁赐给他们的知识之末流和枝叶。所以科举注定以“代圣立言”为永恒主旨;而大学者们竟然也是将获得权力而不是探求知识本身视为人生极致:“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元·严忠济《越调·天净沙》)于是在这种体系中,知识本身的崇高性、知识逻辑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对知

识之真的探求高于一切、以人类理性为穷溯事物本质的唯一前提(康德)、知识评价和传承标准的客观公正等等,都是完全不能想像的。

而其进一步悖逆于现代世界方向的关键还在于,这种知识谱系又是与前现代的法理学、政治社会学等等互为支撑,即一切“学理”、“法理”、“教理”、“事理”、“伦理”等等的本源,都必须被总揽无遗地垄断在统治权力手里。比如法律只能是皇帝和官府的特权(所以人们直接称其为“王法”“官法”);小民百姓之所以永远不能与衙门“讲理”,就是因为以“蚁民”们的微渺之身,绝对没有权利上溯并掌握政治权力合法性和法律正义性的源头;于是留给他们的出路,只能是企盼包青天等大救星将神圣不移的制度逻辑之末端结果赏赐给他们。

所以,在国民必须永远仰承“君、师”无限恩德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党化教育”之类以中世纪式宗旨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在科举之后死灰复燃,就并不困难;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教育现代化有赖于中国整个制度的现代化,而实现这双重目标所需努力的巨大和艰辛,可能是1905年废止科举时人们未曾想见的。以大家更为熟悉的近五十年教育史为例,在经历了全盘学习苏联、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改造、教育革命、乃至终于改革开放等无数的翻覆曲折之后,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教育一旦偏离了现代社会尊重国民的个性权利、崇尚知识本身的价值和尊严、使教育成为天下公器而不能沦为私利工具这些根本的方向,则科举时代的种种遗绪(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对受教育者天性的压制、教育体制的官僚化与腐败化等),就依然可能严重阻碍我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责任编辑 吴思)

(上接 68 页) 比如,民主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生产力还很低下之时,却要一步登天跨入共产主义,这是实事求是吗?

在农业小生产的基础上,能在十五年内生产力赶超英、美,这是实事求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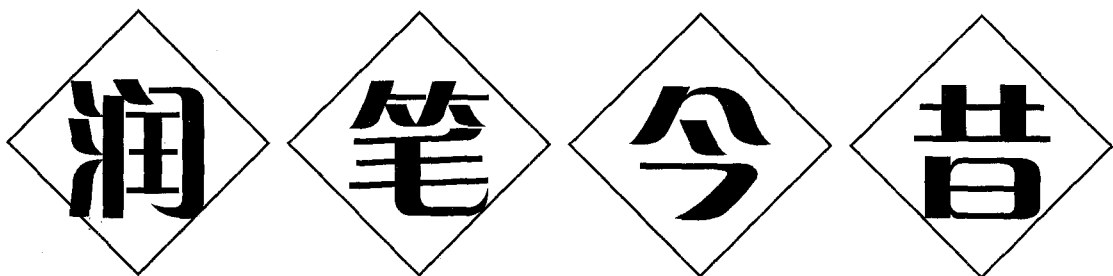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十几年,就猜疑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必然大乱中国,于是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弄得全国大乱,陷入崩溃边

缘,这是实事求是吗?

可见“实事求是”确是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思想方法,违反了它,一个普通老百姓只不过犯小错误,高级领导人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必犯严重的难于收拾的大错误。

可见,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中楼阁。“实事求是”的命运也是这样。

(责任编辑 吴思)



## ● 韩士奇

写文章换钱，古人称之“润笔”，今人叫稿费，据说始于西汉司马相如。南宋王玚《野客丛书》说：“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宫门，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而为陈阿娇皇后写了篇《长门赋》，叙其哀怨，汉武帝读了很感动，将阿娇“复迎入宫如初”。清初考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此事，认为最晚在东汉末年，就有作文付酬的惯例。

说是惯例，不等于凡是写成文章都有报酬，只是说作文付酬的事比较普遍。综合众多记载，大约只有两种文章能得到稿费，一是为皇帝、朝廷、官府起草文件或著述，一是为达官权贵作碑志。北宋司马光受命修《资治通鉴》，成书上奏，宋神宗赐给他“银绢、对衣、鞍辔马”等厚重酬劳；宋人孙抃奉命撰写《进李太后赦文》，讲述仁宗生母李太后事迹，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公开赏赐之外，还把“东宫旧玩”私下赐给孙抃；寇准拜相的制书是杨亿撰写的，文中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一般说来，文人地位越高、名气越大，稿费就越高。《新唐书·李邕传》说，李邕能工文善书，尤善长以行楷写碑，达官显贵纷纷携带金帛登门索求，李邕先后作碑文墓志数百篇，“受纳馈赠，以至巨万”，杜甫《八哀诗》中还专门写到李邕靠作文受谢成巨富后“丰屋珊瑚钩，骐麟织成罽”的奢华生活。

作文付酬，唐代大古文家韩愈最引人注目，他写《师说》得稿酬四五十万钱，写庙碑、墓碑、墓志铭收受酬金更多，他一生为别人撰写了碑铭七十五篇，所得酬金不计其数。仅为国舅王用写一篇神道碑文，国舅儿子送他“鞍马并白玉腰”。当时有个奇士叫刘义，说这些都是“谀墓中人所得”。元和十三年，韩愈奉敕撰写《平淮西碑》，正文 545

字，就得汴州节度使给他绢绸五百匹，几乎一个字就换得绢绸一匹，像这样一笔大数目，在当时一名小吏需工作 30 年才能挣到。难怪韩愈死后，刘禹锡为他做祭文时，文中就有“一字之价，犇金如山”的话。但韩愈还不是作文索酬最高价的人，韩门弟子皇甫湜在宰相裴度门下任判官，裴度要修福先寺，准备请白居易写碑文，皇甫湜知道后卷起铺盖要走，说裴度太小看自己，居然舍近求远，裴度只好挽留并请皇甫湜撰写碑文。皇甫湜“斗酒饮酣，援笔立就”，裴度送他宝车、名马、器玩甚厚。皇甫湜一看怒道：“您也太看不起人了，我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文章，我主动要做是为了感恩知己。全文 3254 字，每字要三匹绢，少一点儿也不行。”裴度虽为权倾朝野的宰相，却也无可奈何，照数送他 9762 匹绢。

不过，古代多数文人的稿费往往是很微薄的。《明史·李东阳传》说，诗人李东阳弃官归田后，生活过得很窘，靠为人写碑颂或应时之文换点钱维持生计。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生动描绘那些每日苦苦写作、卖文所得无几、过着清贫生活的文人作家寒酸相。

进入现代社会，文化人对钱的想法也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认为，写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写作获酬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一大批现代作家及文化人，都靠撰稿获酬来维持生活。就以鲁迅为例说吧，鲁迅一生总收入相当于今 392 万元，大概属中产阶级。从他“而立之年”以后的 24 年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 年收入相当于今 164 万元，平均月收入 9000 多元；中期（厦门广州时期），一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

于今 17.5 万元,平均月收入 1.4 万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九年收入相当于今 210 万元,平均月收入 2 万元。(据学者陈明远《鲁迅一生经济收入》,见 2005 年 3 月 25 日《中国社会报》)钱,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在残酷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主要依靠写作自食其力,自行其是,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新中国实行稿酬制,白云苍狗,变化不小。建国初期,我国稿费效法前苏联,标准较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往往一本书可获五六万元稿

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因而许多作家都买了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在煤渣胡同买了房子,田间买了一座紧挨后海的小四合院。但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后,稿费一直很菲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稿酬制,众多的报纸、刊物、出版社,为文化人写作提供广阔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 6—15 元;20 世纪 90 年代改为 10—30 元;进入 21 世纪初改为 20—40 元左右,依照市场规律,一些经济效益好的报刊、出版社,每千字发到 100 多元左右。

(责任编辑 吴 思)

## 读者来信摘登 (四则)

### 《炎黄春秋》读后感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共产党员,《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我阅读《炎》刊还不到一年,不仅获得了不少知识,而且消解了我胸中的愤懑和忧虑。

《炎》刊里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面目。它探讨的学术专题,能展示各种见解,客观地分析比较,给读者以正确导向。

它情真意切地呼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痛析历史教训,坦陈现实弊端,不偏执,不狂放,字字句句凝结着对人民、对祖国、对党的滴滴真情。铮铮切切的建言,无不发自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心声。视人民群众“是党的根基,党的血脉,党的力量”的党中央,一定会倾听这些声音,并会为之感到宽慰,感到力量。

党自十六大以来,吹响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角。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适时地在党内外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稳妥有序地推行。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必需和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证。若能达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预期目标,那将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态的历史性飞跃。如此重大深入的变革,必然会有很大的阻力,自然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能等到遥远的未来。顺应民心、与时俱进的党中央,一定会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选举权和罢免权。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和专制行为的遗毒,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逐步肃清。当权由民所赋之时,各级官员,一定会真诚自律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一定会再现当年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鱼水相依之情。一个实实在在具有中国特色、繁荣富强、团结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定然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

衷心祝愿肩负民族复兴神圣使命的党中央,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坚定不移地朝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率领中国人民大步前进。

衷心祝愿,体现中国知识精英传统精神、勇于坚持真理、坚决不说假话、直言人民心声的《炎黄春秋》,在民族复兴、和平发展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擂起给人以企盼催人奋进的鼓声。

新疆石河子市 徐亚峰

# 毛泽东约见塞克的史实

炎黄春秋编辑室：

同志们好！

最近阅读了贵刊今年第 11 期刊载的《塞克的人品与文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毛主席约见塞克的情节，与事实不符。为了维护《炎黄春秋》求真务实的办刊宗旨和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作为这件事情亲历、亲办的当事人，有责任将真实情况讲清楚，以匡谬误。

那时塞克同志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党外人士），另有两位党员副院长王真（已故）和吴雪（现已是植物人长期住院），我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剧院工作由我们 3 人共同负责。剧院归中央青委冯文彬同志领导。

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冯文彬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约见塞克，要我通知塞克并陪同他按时去杨家岭毛主席住处（当时中央青委也住在杨家岭）。接受这个任务我很高兴，但也想到，这个人有点怪脾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有所准备，以便圆满地完成任务。

抱着这种心情，我去通知塞克，说毛主席请他去谈一谈，塞克很干脆地回答我：“我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进不得衙门。”这样，我不能不对他做点批评和规劝。我说：毛主席约见你，是你塞克的光荣，也是我们剧院的光荣。你不能把我们的党政机关和旧政府的衙门简单类比，更不应该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和旧政府的官僚类比。同时我告诉他，我将亲自送他去杨家岭，一切手续由我办理，你不能不去，结果他同意了。

随后，按约定的时间，我送他去了杨家岭。杨家岭在延河的东侧，是东西向的一条沟，毛主席的窑洞离沟口百余米，（当时毛主席住处没有院墙，窑洞就在山脚的半坡上）我向设在沟口的总收发说明情况，他们已经知道，让我们直接进去，于是将他一直送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口我才返回。在毛主席住处没有岗哨，为此日前我特别访问了那时在杨家岭做警卫工作的原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长高富有同志和在杨家岭总务处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局局长田畴同志，他们两人一致说，那时毛主席住处从来不要警卫站岗。

塞克见过毛主席后很高兴，并根据他的记录向我们几个负责人作了传达。

我通知塞克去见毛主席的经过，及时向冯文彬同志汇报了，也对王真、吴雪讲过，知情人只有这几个。

那时李卓然同志在西北局任宣传部长（当时我不认识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与我们剧院没有工作关系。毛主席不可能、也没必要请他去找塞克，至于说李卓然同志未能说服塞克，回去又向毛主席汇报，直到毛主席撤掉岗哨、对警卫人员谈话等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文章中将李卓然这位老领导“安排”这样一个“无能”的角色，特别是还编造有关毛主席的言行，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都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不尊重。

联想到去年贵刊有一期登载了一篇文革中监护蒋南翔的文章，作者自称是清华人，对时任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刘冰都不认识，甚至把我和刘冰张冠李戴，其他情节也严重失实。这个问题去年我和黄辛白同志曾与你们的编辑同志谈过，刘冰同志也给贵刊写过信。（编者注：此文刊于 2003 年第 7 期，此信刊于同年第 12 期）为此，我希望贵刊的作者、编辑一起来向求真务实上下功夫，以维护贵刊的良好声誉。对于瞎编乱造、弄虚作假的文章，一经发现，要及时曝光，以保护《炎黄春秋》这块净土免受污染。

以上然否？请酌。

此致

敬礼！

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91 岁）

2005 年 11 月 10 日

附言：塞克同志的一生，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像他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似应由中央有关部门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



# 关于《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的几处小失误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今年第10期《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有几处事实有误。

一、刘亚楼住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不是文中所说的“1965年春”，而是1964年11月27日。

二、刘亚楼夫人名叫翟云英，不是文中所说“翟月英”。

三、文中提及，“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个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其实，刘亚楼请老部下杨成武照看男孩，并不是刘、翟“恋爱时”的事，也没有一个“怕”字，而且与翟结婚前，刘已有两个男孩。文中所提“一个男孩”回国是解放初的事，而刘、翟恋爱结婚却是1946至1947年的事。

四、文中讲5月5日罗瑞卿、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前，又去林彪处，“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

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这也与事实不符。刘亚楼当年病重时，中央高度关心，吴法宪等空军常委到上海轮流守护。5月4日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也就是罗、杨下榻处）还召集吴法宪和空军其他领导如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等一起开会，谈关于刘亚楼的治丧问题，怎么不知吴法宪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呢？

我因长期研究党史、军史，并写过刘亚楼传记，查阅过档案，采访过大量当事人，故知道一些情况。

虽有这些小疵，但瑕不掩瑜，该文还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通过知情者杨成武的口述，告诉世人，所谓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四条”完全是林彪、叶群捏造的无稽之谈！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钟兆云

## 炎黄春秋 感人至深



我是一位退休干部，也是贵刊的一位热心读者，我自费订阅《炎黄春秋》多年，特别近两三年来，我感到贵刊发表的大稿件，叫人读后非常亲切，说出了我们广大读者的心里话，真叫人手不释卷。我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遇到朋友我就将杂志借给他们看，朋友看了也叫好不迭。在我的宣传鼓动下，我们潜山县城这几年贵刊订阅数字大增，我从内心感到非常快慰。我生长、工作在一个山县偏僻的地方，孤陋寡闻，无法向贵刊投稿，随信寄去表达我心迹的《两字藏头诗》一首：“炎黄春秋，感人至深。”望予笑纳。

热心读者

张耐（安徽省潜山县教育局）

本期：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 恭贺新禧

## 2006 农历丙戌年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元旦	2 初三	3 初四	4 初五	5 小寒	6 初七	7 初八
8 初九	9 初十	10 十一	11 十二	12 十三	13 十四	14 十五
15 十六	16 十七	17 十八	18 十九	19 二十	20 大寒	21 廿二
22 廿三	23 廿四	24 廿五	25 廿六	26 廿七	27 廿八	28 廿九
29 正月	30 初二	31 初三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四	2 初五	3 初六
						4 立春
5 初八	6 初九	7 初十	8 十一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十五	13 十六	14 十七	15 十八	16 十九	17 二十	18 廿一
19 雨水	20 廿二	21 廿三	22 廿四	23 廿五	24 廿六	25 廿七
26 廿八	27 廿九	28 三十	29 二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二	2 初三
						3 初四
						4 初五
5 初六	6 惊蛰	7 初八	8 初九	9 初十	10 十一	11 十二
12 十三	13 十四	14 十五	15 十六	16 十七	17 十八	18 十九
19 二十	20 廿一	21 春分	22 廿二	23 廿三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七	27 廿八	28 廿九	29 三月	30 初二	31 初三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0 初三						1 初四
2 初五	3 初六	4 初七	5 清明	6 初九	7 初十	8 十一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十五	13 十六	14 十七	15 十八
16 十九	17 二十	18 廿一	19 廿二	20 谷雨	21 廿四	22 廿五
23 廿六	24 廿七	25 廿八	26 廿九	27 三十	28 四月	29 初二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四	2 初五
						3 初六
						4 初七
						5 立夏
						6 初九
7 初十	8 十一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十五	13 十六
14 十七	15 十八	16 十九	17 二十	18 廿一	19 廿二	20 廿三
21 小满	22 廿五	23 廿六	24 廿七	25 廿八	26 廿九	27 五月
28 初二	29 初三	30 初四	31 初五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六	2 初七
						3 初八
4 初九	5 初十	6 芒种	7 十二	8 十三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	13 十八	14 十九	15 二十	16 廿一	17 廿二
18 廿三	19 廿四	20 廿五	21 夏至	22 廿七	23 廿八	24 廿九
25 三十	26 六月	27 初二	28 初三	29 初四	30 初五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0 初六	31 初七					1 初六
2 初七	3 初八	4 初九	5 初十	6 十一	7 小暑	8 十三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	13 十八	14 十九	15 二十
16 廿一	17 廿二	18 廿三	19 廿四	20 廿五	21 廿六	22 廿七
23 廿八	24 廿九	25 七月	26 初二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八
						2 初九
						3 初十
						4 十一
						5 十二
6 十三	7 立秋	8 十五	9 十六	10 十七	11 十八	12 十九
13 二十	14 廿一	15 廿二	16 廿三	17 廿四	18 廿五	19 廿六
20 廿七	21 廿八	22 廿九	23 处暑	24 每七月	25 初二	26 初三
27 初四	28 初五	29 初六	30 初七	31 初八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九
						2 初十
3 十一	4 十二	5 十三	6 十四	7 十五	8 白露	9 十七
10 十八	11 十九	12 二十	13 廿一	14 廿二	15 廿三	16 廿四
17 廿五	18 廿六	19 廿七	20 廿八	21 廿九	22 八月	23 秋分
24 初三	25 初四	26 初五	27 初六	28 初七	29 初八	30 初九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十	2 十一	3 十二	4 十三	5 十四	6 十五	7 十六
8 寒露	9 十八	10 十九	11 二十	12 廿一	13 廿二	14 廿三
15 廿四	16 廿五	17 廿六	18 廿七	19 廿八	20 廿九	21 三十
22 九月	23 霜降	24 初三	25 初四	26 初五	27 初六	28 初七
29 初八	30 初九	31 初十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十一
						2 十二
						3 十三
						4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7 立冬	8 十八	9 十九	10 二十	11 廿一
12 廿二	13 廿三	14 廿四	15 廿五	16 廿六	17 廿七	18 廿八
19 廿九	20 三十	21 十月	22 小雪	23 初三	24 初四	25 初五
26 初六	27 初七	28 初八	29 初九	30 初十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1 十二						1 十一
						2 十二
3 十三	4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7 大雪	8 十八	9 十九
10 二十	11 廿一	12 廿二	13 廿三	14 廿四	15 廿五	16 廿六
17 廿七	18 廿八	19 廿九	20 十一月	21 初二	22 冬至	23 初四
24 初五	25 初六	26 初七	27 初八	28 初九	29 初十	30 十一



三十年前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

费孝通在五七干校

“以共产主义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熊希龄退出官场之后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

告别科举的曲折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